

資 料

中国における清水安三の記録について

金 丸 裕 一

は し が き

1917年から1946年までの間、宣教・教育・取材活動・被災民救済などを通じて多方面から中国と対峙した清水安三については、これまで既に多くの研究や評伝が世に問われている。それらの熟読を経たうえで筆者は、清水と中国との関わり方、あるいは中国認識の動態をめぐる周作を発表した¹⁾。その準備過程において各種史料や先行研究を蒐集して読み進めたが、本稿は一連の作業にともなう副産物である。

すなわち先人による研究成果を読み解く過程で、中国側によって作成された記録については、従来は必ずしも十分に把握されて居なかったことに気付いた。幸いなことに、2018年夏から在外研究で滞在してい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において膨大な学術資源を利用する機会が与えられ、未知の歴史的素材に接することが可能となった。また、1945年の敗戦乃至は1949年の中華人民共和国成立以降に公刊された文献についても、多くを収集することができた。

したがってこれらの稀覯史料について、全文あるいは一部分を翻刻して、学界における議論の素材として提供したいと思う。更に中国で公刊された研究文献目録について、論文を中心に整理した結果を初稿として附した。但し、書籍については不十分な内容である事に留意されて利用されたい。テキストは凡て手元に複写があるので、研究活動などのために必要な場合は、編者まで連絡があれば提供する²⁾。また、かかる作業にはどうしても見落としや誤記がともなう。この点についても、読者諸賢からの批判・助言を仰ぎたい。尚、2015年以降については、魯迅が清水安三に贈った直筆を謳う色紙が競売に出品されて、高額で落札さるというスキャンダラスな出来事に関する記事群が非常に多く出現しているため、今回の収録対象からは除外した。いずれ、機会があれば別途紹介したいと考えている。

清水安三という、戦前・戦後を通じて真摯に中国と格闘した異色の「支那通」に対する実証的研究がよりいっそう深まる事を、心から期待している。

1) 拙稿『『支那通』クリスチャンと日中戦争—清水安三の働きをめぐって』(『キリスト教史学』第73集、2019年7月)を参照されたい。

2) 筆者の連絡先は次の通り。525-8577 草津市野路東1-1-1 立命館大学経済学部 気付(E-mail: kanemaru@ec.ritsumeai.ac.jp)。

壹、戦前・戦時中の部

- (1) 「賑務處函陸軍部准日華實業協會代表中山龍次函稱太平倉已接收清楚不勝感謝等情函達查照文」十年三月七日（『賑務通告』第12期、內務部賑務處、1921年4月15日）55頁。

徑啓者准日華實業協會代表中山龍次函開前請貴處借給朝陽門外太平倉空屋以爲敝會收養災童之用當蒙函商陸軍部派徐君思誠趙君恩綬會同敝會所派清水安三田村治平兩君親赴該倉將空房兩座接收清楚此皆由貴處及陸軍部格外通融故肯概予撥借敝會實不勝感謝之至等情到處相應函達／貴部查照可也此致／陸軍部

- (2) 「指令 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令京師勸學辦公處」（『京師學務局教育行政月刊』第20卷第20号、1923年？）15頁。

令京師勸學辦公處／呈一件爲呈送調查崇貞平民女學校報告及備案表請備案由／呈悉核崇貞平民學校備案表內開各項大致尚既經勸學員長會同勸學員前往接洽勸導教授設備均頗妥適應即准予備案仰即轉行知照此令

- (3) 劉國定「寄人任君」（劉國定『國定文思』勵群學會、1924年5月）109～121頁。

人任先生：／來信說：『我所說的越文明越野蠻』二語、你要替我加上『物質』『其地』四字、即『地質越文明、其地越野蠻』。我覺得『文明』上、不必加上物質。因爲文明可文物質的與精神的兩種。我所說的文明、是指物質的與精神的兩者而言。如中華、印度等國是精神的文明國。英、美、德、法等國是物質的文明國。即是無論精神的文明與物質的文明的地方越文明越野蠻、請足下毋誤會。

『青年』二字、界說很不易得。我就英文上看來、『青年』爲 Youth 或 The Springtime of Life。又如說『青年會』爲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是『青年』只可說是少年時期的人。來信說：『我覺得『青年』兩字不一定是指年齡少的人。即年齡較大的人、只要思想不古、亦可謂之『青年』、若年齡少的人思想古舊、亦復可以說他是晚年人』。似乎不大正確。少年人思想固然有朽的。老年人思想也有新的。只可說是某少年思想朽、某老人具有青年思想。你以爲對麼？

大著和民聲、大致我看過了、你要我負……責任。我告訴你、思想各有各的不同。你的思想、我表同情的當然表同情、不表同情的、我是有良心的學生、不願籠統罵人攻人。大概你是個富平民思想的人。大著中『貧民之號寒淚』、『說息爭』、『自由之真義』、『課餘雜譚』、『一個中年的婦女自述』、『去兵』等篇、我最佩服。至民聲我少研究、駁江亢虎君數篇、或有作用、且與江氏學說有點不符。你現正在讀江氏著作、請格外注意！

五月二十一日自救會湘支部在省教育會開會。楊主任伯雋以我爲自救會滬會會員敦邀參入、并請余略報告總會情形。在席間得救星” The Salvation Star” 第四十一四十二兩號、戴有日本清水

安三所著之『江亢虎論』、經吾友高儒生君譯成華文。茲錄之、請詳細看看、方知江氏之爲人及其學問道德。清水安三文說：／[中略]／完了。請你拿民聲批評他的來比較一下／你的學校生活如何——愉快嗎？／一九二四、五、二二午後國定。

- (4) 「序言」（臺靜農編『關於魯迅及其著作』未明社出版部、1926年6月）1頁。

我在最近的期間、約有一月工夫、能將這幾年來一般人士對於魯迅先生及其著作的觀察、感想和批評搜集起來、這在我是一件很能慰心的事、因爲我完成了我所願意完成的一部分工作、雖然我並不知道別人對於這事的意見如何。

有一兩篇文字、在我個人是覺得並非無意義的：還有國外的人、如法國羅曼羅蘭對於法文譯本阿Q正傳的評語、和這一篇的俄文譯者俄國王希禮君致宋靖華君的信、日本清水安三支那的新人及黎明運動中關於他的記載、以及最近美國巴特勒特去訪問他的時候的重要的談話、本來都擬加入、後來却依了魯迅先生自己的意見、一概中止了、但反而加添了一篇陳源教授的信。／[中略]／靜農。一九二六、六、二十。

- (5) 「崇貞女學校」（徐珂編『增訂實用北京指南』商務印書館、第五編：公共事業、1926年9月）10頁。

崇貞女學校 朝陽門外神路街

- (6) 王朝祐「回國以後之交際 清水安三君」（王朝祐『我之日本觀』私家版、1927年3月）140頁。

君長於文學。熱心教育。乃東洋之志士也。創辦日文女學校。教育我國女生。圖中日兩國根本上的聯絡。用心可謂周密。十年以後。必能收良好之效果。現在兼主北京週報筆政。在文學上頗有價值。

- (7) 俞康德「自序」（俞康德『增訂模範日語課本』北平郭紀雲圖書館、1935年12月）10頁。

[前略]／這本書之能出版、我必須先感謝京都同志社大學講師清水安三先生、和他的夫人東京青山學院女子專門部的小泉郁子女士。他兩位不但自始至終將全書校閱了一遍、並且還都給作了一篇序。其次、我願意對於題封面的北大教授周作人先生、寫序的齊大校長劉世傳先生、東魯中學前校長豐田神尚先生、東京府立第一商業學校講師王玉泉先生、獻上我誠摯的謝意。而在其他方面幫忙我的高大可先生、朱經古先生、徐霞村先生、張我軍先生、也都是使我忘不了了的。／[中略]／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 俞康德識於濟南



(8) 「新出日文讀本 志恒書店經售」(『天津大公報』1936.1.16) 11面。

齊魯大學講師俞康德先生、最近編著「模範日語讀本」經清水安三、小泉郁子兩先生之校閱、周作人劉世傳諸先生之序與題字、由北平郭紀雲圖書館出版、全書共八十課、分三大部：第一部假名與發音、第二部語法、第三部模範文選、均有極詳細之解釋、與豐富之舉例；全書三百餘頁、實價一元、刻由法租界二十九號路志恒書店經售云。

(9) 「日軍無撤退準備 平發現漢奸潛伏活動 教界決定揭發其陰謀」(『上海大公報』1937.7.26) 3面。

從去年十月我軍退出豐台、日軍在當地建築營房、強佔民地、布置飛機場、重兵駐守該地以後、事實上全北寧路以至北平市、早已入於日本軍事控制之下、以北平為中心的冀察當局、所賴以與中央在一切交通運輸上取得自由聯絡者、僅只一平漢路而已、這回日軍在盧溝橋的行動、很顯然是以劫取宛平城、切斷平漢路、斷絕冀察與中央間之交通、以遂行其侵略華北、使冀察無所逃而不得不明朗化為目的的、但結果因為二十九軍在宛平城與盧溝橋的駐軍奉命抵抗、所以日軍雖然幾次違約猛烈進攻、至今仍未能順利達到目的、在我軍為表示求和平誠現意、已實行將前線三十七師部隊撤退、將宛平城與盧溝橋交由石友三的保安隊接防、但日方前線兵士、並未撤退、且根本未作撤退打算、會不會在一方面誠意真撤兵、一方面武裝假講和的情形下、日軍忽而突如其來的大舉將城橋一舉佔領、這一點、恐怕誰都不敢保證狡詐的日方無此打算、誰也不敢說日軍不再出此舉棄信背約的行動、依照日方要求、我方將平西八寶山、衙門口一帶的三十七師駐軍撤退、改用保安隊接防的用意推測、似乎切斷北平與門頭溝之間的交通、也在計劃與打算之列、過、北平目前雖然已在敵兵進行四面包圍中、成為一座危城、但它在人類文化歷史上、對內對外、都能成為目前中國在國防前線上一個具有極頑強抵抗侵略性的重鎮、它向全世界宣示着它有不可侵犯的神聖尊嚴、它有向全世界宣布大胆向它施行侵略者的罪惡、要求全世界對它加以維護並處罰侵略者的權利、它很高傲鎮定

的表現出它自己雖已是被敵人計劃包圍吞併中的一座危城、但相信敵人決不敢輕易對它加以侵犯、它真十足的代表了被壓迫與正在憤發為雄的新興中華民族的艱難處境與不可侵犯的性格、這一點、確實把目前的一位棄背信義的侵略者困難住了竟侵略者辦法很巧妙的、當盧溝橋炮戰正緊的時候、平市商民、因鑒於情勢危迫、食糧運輸等事、在在緊急堪虞、奔因行集議商補救辦法、會議中忽有某方特務機關長派來的前香河專變的漢奸首領武餘亭等三人闖入、聲稱某方決全國動員對華開戰、北平異常危險、請向雙方請求將北平劃為非戰區域、庶可保持安全、真意是說請你們設法將北平弄成冀東察北的情形、中國方面不准駐兵、日本軍隊得自由出入、那樣便不會衝突打仗了、北平可以平安了、日軍便可以一槍一彈將北平佔領了、這冒昧狠毒的提議、因為沒有人贊同失敗了、走時局一再赴津訪過宋哲元的李書華、李蒸、張貽惠三人、就在這幾天、有一位在北平住過二十多年的一位基督徒牧師、崇文門外某日本小學校長日人清水安三、接連前往拜訪好多次、李李兩人、因與素不相識、未予接見、張與有數面交誼、一度與之接談、彼首告張、謂自己如何對中國愛護、次謂此次一部份少壯日本軍人、堅決主張攻毀北平城、彼以為北平為世界文化古蹟重心、不應聽其毀滅、希望中日兩國人士一致主張將北平劃為安全地、言下似不勝對北平城表示無限愛惜嗟嘆之慨、張對他的答復是「我們願與此城共存亡、這一顯明的狡詐計策、對稍有常識者、當然無所施其技、幸北平市的報紙、這兩天居然出現所謂北平公益維持會負責人劉某擬建議將北平市改為平安城的消息、當然這一主張之非出自劉某本人是可問而知、但自某方藉劉某之口將此項主張發表以後、一般不明內容、不深計利害的人、確有若干受其矇蔽欺騙、平市教育界、認為此事的關係太重了、打算將其中的真情內幕、盡量加以調查、向國人盡情揭發、（十四日）

(10) 代昌「朝陽門外芳草地／崇貞學園／清水安三先生一手創辦／現在已經有二十年歷史」（『民衆畫報』第4期、1939.5.1）3～4頁。

很早很早以前、就聽說北京朝陽門外有一個「崇貞學園」、許多女學生、天天由城裡城外到那裡去走讀、她們都有優越的成績、比市立學校並不弱。上月二十六日、記者特意出朝陽門到「芳草地」、訪問了一下「崇貞學園」、那天、飄著挺大的狂風。

崇貞學園由清水安三先生創辦、那是二十年前的事：清水先生是基督教徒、他到中國來、在民國八年以前、那時候、北五省正鬧著旱災、他曾向本國募捐、救濟那些災民、當年的十二月、他便在太平倉辦了一個「災童收容所」、由清苑繞陽轉收了七百九十九個災童、過年來、麥子收成了、這個收容所便取消、可是、災童收容所也可以算是崇貞學園的老前身了。

後來、清水先生由太平倉移到朝外神路街、在那里花十幾元租了一處民房、又辦了一個簡單的學校、叫做「工讀學校」、清水太太教些手工、當時、學生也很喜歡學手工、因為、朝外一帶會做手工的極少、清水先生把學校製的手工、賣到日本、賺回錢來建築房子。

移到現在的芳草地以後、才改名「崇貞學園」、不過、最初移過去、各國都不景氣、募捐頗不容易、清水先生只好回國、在同志社大學當教授、每星期二十幾個鐘頭、把薪水的二分之一寄到北京來、才延續了崇貞學園的生命。

今年、八月二十五日是崇貞學園二十週年紀念日、他們將要舉行一個慶祝會、紀念清水先生、和他的夫人清水郁子、預料到那天會有一番盛況。

我去訪問的那天、清水先生因為忙、由李惠德先生引導著、參觀全校各處、給我一個非常好的

印象。

崇貞學校中學部、初中三班、以前有高中、後來因爲人太少、便先停辦、小學分六班、不過一年級小學生、又爲了資質優劣、分成甲乙兩班；現在、中小學生一共有華人二百四十名、日人三十名。

這個學校、原意只在救濟貧苦有志女子、所以、學費免收、中學僅僅每學期收雜費三元、小學收雜費三角。

每天上午十一時、他們有一次朝會、讀聖經、像唱詩一樣念着勸勉人的詩句、記者參加那個朝會的時候、正聽見他們唱：「趕快工作、夜來臨、趁着白晝光明、盡心靈盡力量、勉勵惜分陰、分陰飛逝難留住、應當充實善行、趕快工作吧、夜來臨、夜臨工必停」、連六七歲的小孩都會唱。

那裡的學生、每班都自己組有「自治班委員會」、也有主席、主席下分「交際」「衛生」「事務」「風紀」「監察」「書記」「課業」「成績」「體育」幾個委員、他們把自己治理得秩序井然、這該是值得欽佩的事情吧！

日本籍學生、都住在宿舍裡、記者曾到宿舍裡去參觀、全收拾得非常整潔、有幾張床上、還放着一本「讚美歌」。宿舍裡一共二十二個人、四個人住三間房子的也有、三個人佔三間的房子也有、大致分成兩組、一組叫「玫瑰寮」、一組叫做「丁香寮」、名字很美麗、很雅致。

近一個月之中、他們開始建造新校舍、八間大教室、一個體育館、一間圖書館、圖書館用宮殿式、不久落成後、必定非常壯觀。

清水先生書法很好、記者在崇貞學園宿舍門上、看見他所寫標語式的對聯：「微笑笑教而學、不損天賦是教育」、筆走龍蛇、功夫精深。

崇貞學園的校旗上、有三個H字、這是代表Hand Head Heart（手腦心）的意思、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他們却主張「習而時學之」他們都會種花、栽樹、挑花、補花。

崇貞這二十年裡、畢業生一共六百餘名、若加上中途退學的學生、已經過了一千名。畢業的學生裡、留學日本的有六名、到東京學工藝的有二十幾個人、入高級中學和大學的也不少。

清水先生華語很好、人是十分和藹、把記者送出大門的時候、還一邊做耕一邊說：「勞駕、勞駕！」

冒着狂風、又走進朝陽門、想到這個快樂的學園、和那一羣幸福的女孩子、真羨慕他們的生

- (11) Yasuzo Shimizu, China's Rice Christians' a Headache to Missionaries, Says Nippon Writer.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Jul 8, 1939.) pp. 173-174.

Editor's Note: The following is a translation from the book entitled "Shina no Hitobito" (People in China) published by the Rinyu Sha Press, Tokyo. We reproduce it here because of general interest in the subject which the author discusses and the interesting comparisons which are made between Christians in China and Japan. ／〔後略〕

July 8, 1939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73

China's 'Rice Christians' a Headache to Missionaries, Says Nippon Writer

BY YASUZO SHIMIZU

(Principal of the Sotri Gakuen, Peking)

Editor's Note: The following is a translation from the book entitled "Shina no Hitobito" (People of China) published by the Rinyu Sha Press, Tokyo. We reproduce it here because of general interest in the subject which the author discusses and the interesting comparisons which are made between Christians in China and Japan.

STUDY the average Chinese Christian, and you will grasp man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people. Christianity in China prevails mostly among the lower class, whereas in Japan it is propagated chiefly among middle-class intellectuals. Few peoples are less religious than the Chinese. And yet it is a common sight to see in China anything from 500 to 600 persons go to church every Sunday. They are so-called "rice Christians" who go to church for the express purpose of getting not so much spiritual as material help.

It seems to me that in Japan the poorer one is, the less likely is he to become a church-goer. That is why Christianity has had little or no hold on people in the lower stratum of society in Japan. Lu Hsuan, one of China's literary giants, once said, "Many live on teachings; few believe them." The American missionaries with whom I once discussed the question of rice Christians told me that they were utterly sick of such Christians. I cheered them up by saying that in due course of time even those rice Christians would get to know that "it is more blessed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and would gradually turn out to be good devotees of the Christian faith.

Chinese 'Reverse of Religious'

Personally I am inclined to think that most Chinese are the reverse of religious. In Peking, for example, there are churches where some 600 persons congregate every Sunday, but the atmosphere prevailing in those churches can hardly be said to be a religious one. Some of the church members are, no doubt, enthusiasts, but the sermons preached to them are more suggestive of commandments than anything else. They are told to go to church on Sundays, to believe in resurrection, not to go to the theater and so on. There is little spiritual about them. What is more regrettable, they evince no religious fervor. The same is true also of the Salvation Army in China. Talking one self hoarse or shedding hot tears in preaching will not make the slightest impression upon the Chinese.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but to preach religion to Chinese as patiently as possible.

But that does not alter the fact that Chinese are wont to go to church every Sunday and keep on doing so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for 20 or 30 years. I am therefore persuaded that the religious nature of the Chinese is negative, and not positive. Look at Chinese Buddhism, and you will be able to see what the religious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is like. The sect of Buddhism that has survived in China is Zen (Dhyan) which is typically Chinese. If the Nichiren sect is representative of Japanese Buddhism, Zen is a sect perhaps most compatible with the religious na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Should the time come when Christianity in China will require no Western missionary, there would come into being a type of Christianity that will suit the Chinese to

the ground. Such Christianity, if it establishes itself at all, is bound to end by assuming a character somewhat akin to that of the Zen sect of Buddhism. As already stated, quite a number of churches in China enjoy a congregation of 500 persons or more, as many as 1,200 congregate in some of them. In Japan,

tion is not made is almost unbelievable, but it is a fact all the same.

Large Congregations Wanted

I told this to a well-known Japanese clergyman who visited China. This is what he said: "That's news to me. They are out to collect money in churches in Japan, and that is probably why their members are apt to keep away from them. What we want is large congregations. They need not give a gift of money. Frankly speaking, one of the cogent reasons why the church in Japan fails to enjoy popularity is that the Japanese Christian does not show himself a regular church-goer, although he is only too willing to

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



This cartoon by H. E. Homan, an American famed in his profession, is no exaggeration. As reported in The Review of May 13 and 20, a Japanese destroyer last May 2 held up the s.s. Tembien, a ship of Italian registry, which was conveying American Red Cross supplies to Ningpo for the relief of the civilians in that city who had been subjected to Japanese aerial bombings. When told the vessel's mission, the commander of the Japanese destroyer said: "We do not want to help the wounded Chinese. We want them to die." The Tembien was forced to return to Shanghai.

few clergymen are capable of congregating as many as 300. One notable feature in China is that no offering is taken in a church. Without a single exception, the churches in China are maintained by foreign donations. Only an exiguous handful of them are in a position to support their own ministers, even if the number of the congregation there reaches 1,000. If one person made a monthly donation of the paltry sum of 10 sen, such churches could easily support themselves. That even such a small dona-

give a gift of money." Although I am not at one with him, his is one way of looking at it.

Missionaries in China control Chinese followers of the Christian faith. But in Japan missionaries have to content themselves with assisting the Japanese clergy. They all studied theology at colleges or seminaries in their own countries and those destined for China were in no way superior in every respect to those for Japan; only the tendency has been for the former to

(12) 「清水安三」(日本問題研究会編『日本現代人物傳』中冊、商務印書館、1939年7月) 221頁。

清水安三 (Shimizu Yasuzo) / —北平崇貞學園主、現年四十八歳、滋賀縣人。——/一九一五年京都同志社大學畢業、即來中國、初任雜誌「我等」之駐華通信員、後與其妻創立崇貞學園於北平朝陽門附近、專門招收貧苦子弟、與北方勞工界接觸甚多、時在報端發表文章、北京政府時代曾頒給五等勳章。

- (13) 「天橋愛隣館」、「崇貞女學校中學部」、「崇貞女學校小學部」、「清水安三」（李文禔・武田熙編『北京文化學術機關綜覽』新民印書館、1940年4月）46、140、202、343～344頁。

天橋愛隣館／【館址】天橋大街甲十號／▲沿革及成立年月 民國二十八年一月十日成立。／組織 由日本基督教聯盟時局奉仕委員會婦人部及現地委員會共同組織、婦人部及委員會各設委員長一人、委員若干。／▲現在會務概況 醫療部婦產部、教育及其他事業分別工作。／▲館長姓名及略歷 清水安三、前朝陽門外崇貞學園長。／▲職員人數 三人。／▲經費之來源數目及支配 內地委員會募金、經常費預算一年三百元。／▲基金 由日本基督教會供給。

崇貞女學校中學部／【校址】朝陽門外芳花地／（電話）東局二九六九／▲沿革及成立年月 民國十九年六月成立。／▲校長姓名及略歷 清水郁子、日本東京女子高等師範畢業美國オペリン大學神學部卒業。／▲教職員人數 未詳。／▲全年經費數 一萬元。／▲經費來源 日本人捐助。／▲學生人數及班數 一八五人共六班。

崇貞女學校小學部／【校址】朝陽門外芳花地／（電話）東局二九六九／▲沿革及成立年月 民國十九年六月成立。／▲校長姓名及略歷 清水郁子、日本東京女子高等師範畢業美國オペリン大學神學部卒業。／▲教職員人數 [空欄]／▲全年經費數 一〇〇〇〇元。／▲經費來源 日本人寄附。／▲學生人數及班數 一八五人共六班。

清水安三 基督教牧師、崇貞學園長。著書有「支那的新人物」、「朝陽門外」、「姑娘的父母」。

- (14) 「支那之友」（『全国雜誌社一覽』中央宣傳部宣傳指導處徵審課、1941年3月）101頁。

支那之友 | 清水安三 | [刊行狀態空欄] | 警字第四四二一號 | 北平支那之友雜誌社 | 30,1,13. 註銷

- (15) 「清水安三」（外交部亞洲司研究室編『日本時人辭典』中央電訊社、1942年6月）192頁。

清水安三 (Shimizu Yasuzo)／北平崇貞學園主、一八九二年生、滋賀縣人。／一九一五年京都同志社大學畢業、即來中國、初任雜誌「我等」之駐華通信員、後與其妻瀨立崇貞學園於北平朝陽門附近、專招收貧苦子弟、與北方勞工界、接觸甚多、時在報端發表文章。北京政府時代、曾頒給勳章。

- (16) 「日大使館表彰優良日僑」（『申報』1944年3月8日）1面。

▲南京七日中央社電 駐華日大使館當局、前於本年日本紀元節對於盡瘁於中日親善之在中國日僑民八名、分別予以表彰、現更嚴格選定下列日僑民十一名、及二團體、以其致力於兩國友好提携、可資嘉獎、特分別授與表彰狀、㊶上海星野秀樹教授中國人日語、貢獻於作育日語人材、㊷上海頓宮寬盡力於治療及衛生防疫、扶助中國醫界向上進步貢獻於醫療執善、㊸廈門神田末清、常時期盡力中國佛教之發展與興隆、盡力於中國民衆之福利至鉅、㊹上海內山完造經營出版業、貢獻於兩國思想文化之溝通與互相理解、㊺上海山田純三郎、援助國父孫總理、盡瘁於第一革命、其後又

努力溝通中日兩國人之思想、貢獻於兩國提携至鉅、⑥北京山室光、對於作育中國人子女、實踐善鄰精神、功績至鉅、⑦上海山岸多嘉子救恤扶助一般中國人、盡瘁於中國女子教育至鉅、⑧張家口松井絕巖、教化保育中國人貧苦民衆、協助開墾水田等甚力、且創設辦日語學校、教育中國人日語、頗具成績、⑨張家口是永章子、專心於教育中國人日語、□□宣撫民衆、⑩南通江北興業公司、努力振興華北之經濟、並經營各項營業、貢獻於實踐善鄰友好之功頗鉅、⑪北京天橋優鄰館實施救濟事業、精勵全體職員、從事於善鄰友好、⑫北京三澤旦貫、創立北京厚生醫藥整、貢獻於普及農村醫療、⑬北京清水女士經營私立崇貞女學校、協力清水安三氏、從事中日親善教育之功績極鉅。

(17) 「日僑民廿一人／國府予以褒揚／對中日親善貢獻至鉅」（『申報』1944年4月1日）1面。

▲南京三十日中央社電 行政院以中日兩國訂立同盟條約、及大東亞共同宣言之際、兩國國民、允宜相互提携、造成風氣、查有友邦僑民崛井利文等二十一人、或以教育造就我人才、或以醫術嘉惠我黎庶或從事於振濟、教養我寡婦孤兒、或盡瘁於實業、助長我農村生產。凡茲諸人、不惟裨益邦交、抑且有功政府、特呈准國府、從優嘉獎、計盟邦僑民崛井利文等二十一人、各予頒給嘉許狀一紙、獎金合計國幣一千五百二十萬元、由外交部函送日本大使館、酌量分配。此事已由宣傳部、於昨（廿九）日下午三時、發表如下：

宣傳部發表

（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時）日前盟邦駐華谷大使閣下、對該國僑居我國盟邦僑民中、對中日親善友好獻身努力之優良者、及其事業、經二次予以褒揚令後、仍隨時予以褒揚。國民政府汪主席、對於谷大使所褒揚之盟邦僑民、及其事業、特於還都紀念日、給予褒揚狀、及賜予褒獎金。國民政府就該褒獎金中、對於受獎個人及團體之努力、與特殊行為、一律贈予褒獎金一封、並對該事業認為有資金援助之必要者、就其事業上之需要、贈予相當金額。所餘獎金予則預備作谷大使將來給受褒獎者之褒獎金。此次受褒獎狀及獎金名單如左：一・救恤事業、松井絕巖（大同）、天橋愛隣館（北京）、山岸多嘉子（上海）、楠木安子（上海）、神田末清（廈門）。二・教育事業、星野芳樹（上海）、山下默應（溜川）、三澤元貫（北京）、是永章子（張家口）、清水イ力（北京）、山室光（北京）、吉利平次郎（青島）、豐田神尚（濟南）、藤江眞文（天津）、松尾豐德（漢口）。三・醫療事業、崛井利文（宣化）、頓宮寬（上海）。四・其他事業、內山完造（上海）、山田純三郎（上海）、滿蒙毛織北支本部（北京）、江北興業公司（南通）。

國民政府令

（三十三年三月三十日）據行政院呈、以中日兩國自訂立同盟條約、暨大東亞共同宣言以來、邦交日固、親善益□。兩國國民間、以相互提携之事實、造成風氣、允宜嘉導。茲查得友邦僑民崛井利文等二十一、或以教育造就我人才、或以醫術嘉惠我黎庶、或從事振濟、教養我寡婦孤兒、或盡瘁實業、助長我農村生產、凡茲所為、不惟裨益邦交、抑且有功政府、似非從優褒獎、不足以示報酬。現屆還都四週年紀念之期、謹將各該有功於中日親善之友邦僑民、崛井利文等二十一人、開具姓名及事實表、呈請鑒核、准予明令褒揚、并頒發嘉許狀、優給獎金、以昭激勸、而勵來茲等情。友邦僑民崛井利文、豐田神尚、吉利本次郎、楠木安子、山下默應、松尾豐德、滿蒙毛織株式公司華北本部藤江眞文、星野芳樹、頓宮寬、神田末清、內山完造、山田純三郎、山寶光子、山岸多嘉

子、松井絶巖、是永章子、江北興業公司、天橋愛鄰館三澤允賞、清水イ之等、與我國教育文化、慈善實業各要務均致力有年、熱誠宏效、殊途同歸。贊助親善、詢屬有功、除分別頒給嘉許狀各一紙、並頒獎金一千五百二十萬元、由行政院轉飭外交部、送請日本國大使館、酌量分配、以示補助外、特予褒揚、此令。主席汪兆銘、兼行政院院長汪兆銘。應褒獎友邦僑民姓名事實○掘井利文 自民國三十年在宣化縣開設醫院、免費治療、中國民衆受惠者、達四千五百餘人。○豐田神尚 自民國前五年、任山東省立曹州師範學堂教諭以來、於今三十七年、中國學生受其薰陶者達三千人。○吉利木次郎 自民國五年四月、設立中日兩國子弟同校之青島學院以來、由國學往受其薰陶者、不下二千餘人。○楠本安子 自民國三十年、在江蘇崑山縣設立小兒園、致力幼堆教育、復於民國三十二年、轉任上海濟良所、從事收容孤兒棄兒、及無家可歸之婦女。○山下默應 自民國十年、在山東淄川縣設立曹洞之布教所、其後改為風井學校、教化兒童、迄今二十餘年、盡瘁於中國子弟之教育、受益者達一千八百餘名。○松尾豐德 自民國十年、任職於漢口同文書院、前後二十餘年、盡瘁於中國子弟之教育。○滿蒙毛織株式公司華北本部 自民國二十六年以清河鎮為中心、經營農園、專授專門技術、增進農村生產、功效卓著。○藤江真文 自民國十年以來、經營東亞同文會、對於中日兩國之提携融和、貢獻至鉅。○星野芳樹 自民國三十一年、在滬設立容海語學校、對於普及日語貢獻至大。○須宮寬 自民國九年、在滬開設福民醫院、並任工部局醫師二十餘年、以醫學知識貢獻中日親善。○神田末清 自民國十三年來華從事宗教事業、對於兩國佛教之發展與交流、貢獻甚大。○內山完造 自民國二年來華、努力出版工作、對於中日文化之交流、與中日兩國之相互理解、貢獻至大。○山田純三郎 自前清先緒三十二年來華、追隨國父、盡瘁中國革命運動、厥功甚鉅。○山寶光子 自民國二十七年、來華設立中國子弟教育機關之東京自由學園、對於善隣友好精神之表現、頗著功績。○山岸多嘉子 自民國二十八年、在上海浦東南匯組織中國婦女協進會以、盡力提高中國婦女之修養、與社會地位之向上、卓著成功。○松井絶巖 官民國二十八年、在大同城內開設曹洞宗教所、醫治中國貧民、並於民國三十二年、組織水利組合、計劃開墾水田、有功農民甚鉅。○是永章子 自民國二十八年、來華在張家口成立回教女塾、教導當地回教女子、頗著成效。○江北興業公司 該公司在江北地區、研究各項經濟事項、並創設農事試驗場、加強農村生產、厥功甚鉅。○天橋愛鄰館 該館於民國二十七年、設於北平貧民街天橋地區、致力與救濟厚生事業、對善隣友好、貢獻甚大。○三澤元貫 自民國二十七年、在北平設立厚生藥藝、教授中日青年醫藥知識、並於各鄉區發生傳染病時、派遣學生協助防疫工作。○清水不力 自民國二十四年、任北平私立崇貞女學校教務主任迄今從事中國女子教育、功績頗著。

貳、戰後（1945～1999年）の部

(18) 「北平敵校校產 移交市教育局 用以擴充地方教育」（『大公晚報』1945年12月24日）1面。

【北平孟十二日發專電】教育部特派員辦公處決定以一系列敵產移交市教育局為擴充地方教育之用、其中具已先請准行營准予動用、故今冬市立十七個中學及八十六個小學均係借用其中之煤爐以供取暖之用。茲將此項敵產下：日本城校（北新華街三十五號）、日本航空青年學校（西郊南村）、日本城北國民學校（白米倉）、私立崇貞女學校（朝陽門外芳草草地）、北京日本中學校（崇元萬）、日本外城民學

平冈教授是老一辈的学者，白居易研究专家，著有《白氏文集校定》，在学术界熟人很多。他离座到别的桌子转了一下，又回来坐下说：“清水安三近九十岁了，身体很健康，住在东京。他是樱美林大学的创办人，现在仍然担任着校长。”

同席的接待委员会委员、京都大学教授清水茂先生从身边摸出小本，将这件事记下来，告诉我回到家里，他将直接向东京接待委员会挂电话。

事情就这样从京都转到东京。我这里必须掉转笔头，对包括清水安三父子在内的东京朋友们表示感谢。东京的安排也是十分周到的。我到达后就被告知：清水安三先生非常高兴接待来自中国的客人，因为樱美林大学离我下榻的旅馆太远，他的腿又不便，决定在日曜日十二时，借座距离双方差不多里程的八芳园，设宴招待我，顺便谈谈他在北京和鲁迅往来的经过。

六月十七日早晨十时，松井教授亲自驾车，和尾上教授一起来到旅馆。我匆匆收拾一下，带点小礼物，随着出发。路过神保町，那一带全是书铺，车内可以望见内山书店、东方书店、岩波书店的招牌。因为是星期日，书店没有开门，时间又过于迫促，来不及下车一游，便直奔目的地了。

原来八芳园是个很大的花园，极象阔人或者将军的府第。进门一片宽广的草坪，远处林木成荫，杜鹃盛开，有岩冈、有曲径，亭台楼阁，布置幽雅而格局宏伟。八芳园的房屋分成三个独立的组合：日本料理部、支那料理部、西餐部。松井教授把车一直开到日本料理部的楼前。清水安三的儿子小清水先生和几个熟识的朋友，将我引入大门，脱去皮鞋，走过曲折的廊道，进入一个大约有二十几席宽的屋子，中间用矮几连成长桌，人们隔桌相对，席地而坐。我被带到一边的中间，对面是位穿西服的长者，我想，这大概是主人清水安三了吧。他右手按住席子，正想站起来，我连忙阻止。坐在他身旁的小野忍先生和我握手，劝我坐下。小野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专家，写有《中国现代文学》一书，翻译过古典小说《金瓶梅》和《西游记》，我们在东京大学一起座谈过。这时我才注意：今天出席而在东洋文化研究所见过面的，还有伊藤虎丸、丸山升、尾上兼英、松井博光、德永淳子……等各位，此外则是石川忠久、南云智、新村彻、小清水……等在樱美林大学教授中国文学的专家。

清水安三先生虽然八十九岁^①了，看去却不过七十岁左右。肤色健康，肌肉结实，脸上略有几点老年斑，颌下留着灰白的长髯。下颏微微抖动，开始准备说话。小清水先生在一旁照料他：“您先吃吧，吃完了慢慢讲。”

清水老人一面招呼客人，一面撕开纸袋里的竹筷，挟起一块刺身^②，细细地咀嚼着。他喝了几口青酒，仿佛记起什么重要的事情似的，用筷子搅着酱油，情不自禁地又讲了起来：

“我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前，从沈阳来到北京的^③，一九二四年前往美国。住了三年。以后也在上海和鲁迅见过面。不过，我们的主要交往在北京。我办崇贞学园^④，参加《北京周报》，都在北京。在中国住了几十年，现在老了，还时常做梦，梦见北京的生活。……许多事情就象发生在昨天一样。”

清水先生坠入回忆里。他说得很安详，很平静，一点不动感情。但是，这些平淡的语言又似乎牵系着更为深远的思念。

《北京周报》是一份用日文刊行的报纸，创刊于一九二二年一月，时当五四运动之后，周报译载了文学研究会冰心、叶绍钧、庐隐、周作人等的作品；也译登过创造社郭沫若、成仿吾、郑伯奇等的论文。在“支那和支那关系人物介绍”一栏里，笔名昏迷生的丸山幸一郎发表了《李大钊氏》、《周树人氏》，清水也写过《陈独秀论》。此外还有胡适、钱玄同以至辜鸿铭的文章。鲁迅《中国小

说史略》的一部分，小说《孔乙己》、《兔和猫》，都译载在上面。当清水准备接着开口的时候，我觑空抢先问：“您最初去见鲁迅先生，就是为了替《北京周报》组稿吗？”

“我去组稿，但不是专为《北京周报》。”清水先生回答，“那时爱罗先珂住在八道湾十一号周宅。国内的报刊要我向爱罗先珂约稿，他刚被日本政府驱逐，但在日本还是很有名。我也向周氏兄弟组稿。”

老人喝了口酱汤，停下来想了想，继续说下去：“我第一次找的周作人，他是爱罗先珂的翻译。作人有点贵族味道，摆架子，故意装作不在家。鲁迅先生从左厢房出来开门，邀我进去坐，这样便认识了。鲁迅的日语讲得和爱罗先珂一样好。周作人虽然娶了日本人做妻子，日语却讲得不好，听起来有一种奇怪的腔调。……”

我不提什么问题，让老人自由自在地讲下去。

“我常去看爱罗先珂。一向觉得周家是和睦的，兄弟怡怡，作人没有在我面前讲过鲁迅的坏话。直到后来，我从文章里才读到。信子人也不坏，气量狭小，有点唠叨，鲁迅《鸭的喜剧》发表后，我开玩笑叫她‘鸭子’，她不以为忤。……一九二三年八月一日，鲁迅在日记里记着在伊东寓所遇见我，同至咖啡馆小坐，因为要搬家，借车子。我认识一个叫福本的海关税员，是大山郁夫的弟弟，他有汽车。第二天搬家，弟兄俩闹翻了。……后来从砖塔胡同搬到西三条，也是我给借的车子。”

“您知道他们闹翻的原因吗？”有人问。当清水安三试图答复这个问题的时候，小清水先生对父亲说了很长一段话，我没有注意说什么。后来，清水老人解释说，据他的猜想，这件事和山本医院有牵连。鲁迅和山本贤孝关系很好，还常常提起山本夫人田鹤子。每次上医院看病，为老太太取药，都要带点糖果什么给山本的孩子。周作人的女儿若子死在山本医院。夫妻俩认为是医疗事故，周作人曾在《顺天时报》登过启事，攻击山本医院。鲁迅没有理会这些，他照旧上山本医院看病，给老太太取药，买糖果给山本的孩子吃。羽太信子大为不满。清水老人为了证实这两件事有关系，他象背书一样背出了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鲁迅的日记。那一天，鲁迅上午往山本医院取药，下午到八道湾搬书，事情发生在同一天，清水很有把握地说：“结果是：打架了。”他又进一步说，“鲁迅信任山本贤孝，从医道上信任他，也从政治上信任他。山本掩护过进步文化人。”

“文献上指这是张作霖时代的事情：进步文化人到山本医院避过难。”小野先生插了一句。“山本也和李大钊熟识。”清水老人完全沉醉在自己的故事里，他说，“当佐野学在国内住不下去的时，到中国找李大钊。我使他们两个见了面。经过李大钊的帮助，他才从天津搭乘美国商团的船去了俄国。”

老人说得高兴起来，绘声绘色地追述了自己去车站为佐野送行的情形。他说这种事情周作人是不会理解的。他还清楚地记得：庐山会议以后，大约是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吧，胡适从伦敦寄了一首诗给周作人，敦促他离北京南下；清水也乘间劝告：日本是要失败的，希望周作人慎重考虑。周作人不听，结果当了汉奸。太平洋战争爆发，据清水说曾在一次会上见到周作人。他穿着缎子袍褂，象过节日似的，神采奕奕，坐在前排。清水老人一面追述，一面叹息说：“真是当了官，增了光了。”

小清水先生多次劝他父亲歇一歇，慢慢讲，看来话匣子一打开，老人自己也无法控制了。清水安三继续告诉我：他有时仍往八道湾。武者小路实笃到中国，就由他陪着去见周作人。清水还说，围绕着八道湾正房的变迁，可以看出周作人思想生活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老太太住在中院正屋，前院西厢住鲁迅，东厢住周建人；后院一排九间，爱罗先珂借住东首三间，西首是周作人一家。那

时全家上下很和睦。第二阶段，老太太随着鲁迅搬出八道湾，周作人占了中院，正屋变成书房，搭起木架，摆满书籍，他就在那里抄古书，写小品文，与现实隔绝了。第三阶段，书籍搬到东西厢，正屋放上沙发案几，成为豪华的客厅，专门接待贵宾，主人当上汉奸，背叛了自己的民族。清水安三说时不免有唏嘘惋惜之意。我决定把话题引回到鲁迅这边来。我问：“您知道爱罗先珂对周氏兄弟的看法吗？”

“在北京大学一部分人的眼里，起先，周作人似乎更为重要些：他是教授，而鲁迅不过是讲师。爱罗先珂也是讲师。他的看法和别人不一样，这位盲诗人是敏感的。他对我说，‘日本还没有一个象鲁迅这样的作家！’他从心底里赞扬鲁迅，佩服鲁迅。”

“您在《周三人》里介绍鲁迅和他的小说。听说当初还译过《孔乙己》，将译稿寄给鲁迅，请他修正，结果改为鲁迅口译，由您笔录。这是真的吗？为什么后来发表的《孔乙己》，又写着‘仲密译’呢？”

“我不记得有将译稿送请鲁迅修改的事。但的确有这么一回，我将诗稿送请鲁迅指正。他看了说：“不要做诗了，你不能做诗。”……”

一听这话，在座的人全都哄笑起来。清水安三没有笑，他继续说下去：“许多人说《藤野先生》是一首诗，这是不错的。但藤野先生却是一个现实的存在，我觉得，鲁迅自己就是藤野先生。讲到《孔乙己》的翻译，可能和《兔和猫》一样，也由鲁迅本人译出，发表时一个用‘鲁迅作，同人译’，一个用‘鲁迅作，仲密译’，多一点变化。不过这仅仅是我的猜想。因为我还记得：《鸭的喜剧》是先用日文写成的，然后再译成中文，那是怀念爱罗先珂的，也表达了鲁迅自己孩子似的纯洁的心地。他生成一种不肯迁就的性格，对别人却非常和善，照顾得很好。”

清水安三先生似乎又坠入沉思了。

我怕老人过于疲劳，便从布包里取出带来的一张织锦画幅，说明为了感谢清水先生盛情的款待，为了纪念能在日本见到鲁迅先生一位早年的朋友，借这小小礼物，表示自己对长者的一点敬意。我立起身，清水先生也以迅速的动作从席上站起，双手接过画幅，一面看，一面连连称赞：“真美！真美！”

他大概又将做关于中国的梦了。

在门外照了几张相，我们便在草坪上散步。这确实是个很大的花园。我们沿着小径向林木深处走去，一丛丛盛开的杜鹃含笑相迎。前面是架小桥，桥对面土阜上立着一个中国式的亭子，溪水流入池塘。几只白鹅，三对鸳鸯，恬静地、一动不动地浮在水面。林间荡漾着仿佛是笙箫的悠徐的声音。一起散步的日本朋友告诉我：今天是日曜日，日本的家庭喜欢挑选这一天，挑选在中国料理部举办喜事，这大概是从那里传来的音乐。真的，这音乐听起来十分熟悉，便是入耳后那种悠远、舒徐、安闲的情趣和声调，也是我凝神遐想时常有的感觉。我抬起头望天，故乡一样熟悉的景色呵：天空碧澄澄地，象一个蓝色的海洋，上面飘着几朵棉絮似的柔软的白云。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五日 写毕于庐山疗养院二分院

①我回国后，查日本出版的有关资料，记清水安三于一八九一年生于日本滋贺县，那么应是八十八岁，可能介绍时按中国习惯计算。

②刺身，读如萨西米，即生鱼肉。

③据日本出版的有关材料，记清水安三于一九一三年三月来到北京。

④崇贞学园，一说即现在的朝阳中学。

⑤胡适这首白话诗写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四日，共八句。第一句为“藏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末二句是“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劝周作人南行。因为那时胡适已去华盛顿，周作人于九月二十一日写了一首答诗寄至美国，诗里表示自己有“老小”，不能离京。

②0 戈宝权「鲁迅研究新成果的汇集——介绍1979年号《鲁迅研究年刊》」（『人民日报』1981年1月17日）8面。

鲁迅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他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极宝贵的精神财富。早在艰苦斗争的1941年，革命根据地延安就成立了鲁迅研究会，并出版了《鲁迅研究丛刊》。

全国解放后，有人写信给许广平同志，建议编辑鲁迅研究年刊，但一直未能实现。近年来，我国各地的鲁迅博物馆和纪念馆，以及不少高等院校，都先后成立了鲁迅研究室，并出版了鲁迅研究丛刊。这不仅是全国鲁迅研究者的共同愿望，同时也是热爱鲁迅的广大读者都感到高兴的事！

《鲁迅研究年刊》是由西北大学郭琦和宇新担任主编，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当我不久前接到这本年刊的样本时，心里有着说不尽的喜悦。首先是王光艺设计的封面就吸引住我。在乳黄色的封面上，以鲁迅写的《拿来主义》的手稿为背景，上面加印着张松鹤制作的鲁迅浮雕像和周建人写的“鲁迅研究年刊”几个刚劲有力的题字。

当你打开这本十六开的将近六百页的《年刊》时，从《编者的话》和目录中，你就会发现全书图文并茂，尤其是木刻画家彦涵为《年刊》所制的鲁迅像和为《孔乙己》、《明天》、《白光》、《祝福》等小说所作的插图，还有黄新波的遗作《怒向刀丛觅小诗》（版画）和裘沙画的鲁迅像素描等，都使得《年刊》更为生色。

在“对《鲁迅研究年刊》的希望”栏目里，我们首先读到了鲁迅生前的老友茅盾、曹靖华等人的良好祝愿与希望。如茅盾在《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的访问》中说：“鲁迅研究中有不少形而上学，把鲁迅神化了，把真正的鲁迅歪曲了。鲁迅最反对别人神化他。……我希望《年刊》不要搞形而上学，不要神化鲁迅，要扎扎实实地、实事求是地研究鲁迅”。李何林则提出，在研究鲁迅领域中，“要勇于贯彻‘百家争鸣’方针”。这些话可说是语重心长，值得鲁迅研究者的重视与深思。

在回忆鲁迅的文字中，我们怀着很大的兴趣读到周建人的文章《鲁迅为何弃医学文艺》和《回忆鲁迅片断》、楼适夷的《鲁迅二次见陈赓》等。这些文章给我们提供了第一手的珍贵资料。

鲁迅的佚文，近年来不断有所发现。《年刊》发表了不少佚文，这是极为重要的文献。

在《年刊》中还发表了不少很有分量的研究文章。其中有研究鲁迅思想发展的，还有些是注释鲁迅的书简的，如《鲁迅致徐懋庸七封信的注释》，《鲁迅先生书简注释及其它》等文，都很有参考价值。

鲁迅不仅是中国的伟大的作家，同时也是享有崇高的国际声誉的伟大作家，因此《年刊》专辟有“鲁迅研究在国外”的栏目。如《鲁迅的世界地位与国际威望》一文介绍了外国作家对鲁迅的评价，以及外国翻译出版和研究鲁迅著作的总的情况。由于日本是翻译鲁迅作品最早也是出版鲁迅研究论著最多的国家。这里选择了鲁迅在仙台留学时的老师藤野严九郎写的《谨忆周树人》，以及清水安三、内山完造、增田涉等人写的回忆鲁迅的文章。此外还翻译了美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学者所写的有关研究鲁迅的文章。

整本1979年号《鲁迅研究年刊》，其中所刊登的文章，大部分都是1979年新发表的。在国内作

者方面，包括有我国老、中、青三代的鲁迅研究者，也包括一些港澳地区的研究者和国外的一些研究者，因此，这本《年刊》可说是国内外鲁迅研究方面的新成果的汇集。我高兴地把它介绍给我们广大的读者，同时也预祝1980年和1981年的《年刊》早日出版，在汇集和促进鲁迅研究工作中作出更新的贡献！

- (21) 胡京春·禹善「李大钊赠给日本友人的北大二十周年纪念册今归故里」（『光明日報』1985年8月28日）2面。

本报讯 日本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部教授、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家野泽丰先生最近将李大钊当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时赠给清水先生的《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赠送给中国革命博物馆。〔中略〕

李大钊在题字中所称“清水先生”，即清水安三先生。他是近代来华之日本友人和进步人士，他同情中国人民的民族救国事业，写过许多研究和宣传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著作和文章，同李大钊和鲁迅有过友好交往。一九二四年，他通过《支那新人与黎明运动》这一代表性著作最早向日本社会介绍了李大钊等革命志士。

据野泽丰先生介绍，北大廿周年纪念册是他从东京神保町的山本旧书店买回的，至今已收藏了二十多年。（胡京春 禹善）

- (22) 袁良骏「难得的大家风度」（『人民日报』1985年12月25日）8面。

1926年顷，鲁迅已经成了享有世界声誉的大作家，他的名作《阿Q正传》等已先后译成了日、俄、法等国文字。这时，鲁迅的学生、朋友、青年小说家台静农（现在台北大学任教）编集了我国第一本研究鲁迅的论文集，题名为《关于鲁迅及其著作》，除收入周作人、茅盾等评论鲁迅、访问鲁迅的十二篇文字外，还收入了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对《阿Q正传》的赞语以及俄、日、美一些作者论及鲁迅的有关文字。书编成后，台静农特请鲁迅过目、指正。鲁迅提了这样三条意见：一、删去周作人的《阿Q正传》评论；二、删去所有外国人的文字；三、添上陈源的《致志摩》。

出于对鲁迅的敬意，台一一照办了。在《序言》中他这样写道：

“有一两篇文字，在我个人是觉得并非无意义的；还有国外的人，如法国罗曼罗兰对于法文译本《阿Q正传》的评语，和这一篇的俄文译者俄国王希礼君致曹靖华君的信，日本清水安三《支那的新人及黎明运动》中关于他的记载，以及最近美国巴特勒特去访问他的时候的重要的谈话，本来都拟加入，后来却依了鲁迅先生自己的意见，一概中止了，但反而加添了一篇陈源教授的信。”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外国人的文字，都是赞扬鲁迅的小说创作的；而陈源教授的《致志摩》却是对鲁迅大搞人身攻击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某些奴性十足的人们，往往以为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鲁迅偏偏要把外国人的赞词删去，恐怕是针对了这种社会现象和社会心理的。鲁迅并非不感激那些对他的创作提出了中肯批评的外国朋友，但基于当时不幸的社会现实，他宁肯将这些可贵的意见统统删去。

至于劝编者将《致志摩》收入，则尤为表现了鲁迅的大家风度。陈源的这封信，发表于1926年

元月30日の《晨报副刊》，而台静农的《序言》则写于6月20日，相距仅有数月。即使不管内容和文风，仅仅从时限考虑，台也完全有理由将这封信排除在編集范围之外。但鲁迅却执意编入，这就说明他是有意要容纳正确、错误、攻击等各种不同的意见，而不愿仅仅听到肯定和颂歌。后来，这变成了鲁迅的一种突出风格，在一些论战文字中，他有意要尽量收录论敌的文章，而不是一见否定、攻击便火冒三丈。

俗话说：泰山不拒土壤，方能成其高；江河不拒细流，方能就其深。任何一个伟大作家、伟大人物都是有这种吐纳宇宙的大家风度的。这一点，似乎很可以为我们今天的某些少年得志的青年作家戒。即使鲁迅主张删掉他弟弟周作人肯定《阿Q正传》的文章，又何尝不是一种一般人不易做到的大家风度呢？

参、2000年以降の部

- (23) 「Shimizu, Yasuzo」(黄光域編『近代中国专名翻译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 635頁。

Shimizu, Yasuzo (1891—) 清水安三 日本天主教教育家，1915年来华。

- (24) 「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北京市朝阳区志(初审稿)』北京市朝阳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1年12月) 513頁、520頁、523頁。

[前略] 1912年京师学务局取缔私塾，撤并后改为简易小学或识字班。私塾名亡实存。1915年建万子营小学。1917年建楼梓庄、北马坊、金盏、长店4所小学。1918年建豆各庄、驹子房、奶子房、清河营、马泉营、崔各庄、大屯、北甸、辛堡、北皋、孙河、来广营12所小学。1920年建常营小学。1921年在朝外碑楼胡同建崇贞平民女子学园，属私立教会学校。经费由基督教日本牧师清水安三募捐所得。同年建大鲁店驼房营2所小学。[後略]

1936年朝阳门外私立崇贞女子学园增设中学部。校名为私立崇贞女子初级中学。1946年私立崇贞女子初中改名北平市第四女子中学。

陈经纶中学 位于朝阳门外东大桥，是一所面向全市招收高中学生的完全中学。前身为崇贞平民女子学园、崇贞女子学园、崇贞女子初级中学。1945年定名北平市第四女子中学，1947年增设高中班。1949年改名为北京市第四女子中学，1956年为北京市重点中学。1967年学校改名为朝阳中学，男女学生合校。1989年，香港同胞陈经纶捐资2000多万元人民币，在朝阳中学和东大桥中学校址上建校。1991年落成并启用，改名陈经纶中学。

- (25) 张玉梅「建成个性化的首都名校—陈经纶中学全面建设北京市首批高中示范校侧记」(『光明日报』2003年4月13日) A2面。

陈经纶中学是一所有着80多年历史的名校。漫长的历史为她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也形成了

优良的办学传统。她曾有着令人骄傲的育人业绩，近几年由于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学校也一度出现了教育改革滞后，教职工积极性不高、学生高考成绩滑坡的现象。面对这种情况，朝阳区教委大胆启用了第一位竞争上岗的校长张德庆，这位长期从事基础教育工作的教师曾获得过北京市模范班主任和紫禁杯班主任特等奖。他带领全体师生争办了朝阳区第一所市级示范高中，几年来，他推动教改、注重科研、完善管理，抓住建设示范校的机遇，使陈经纶中学整体办学水平又跨上了新的平台，80年老校又焕发了新的青春。

优雅的环境让学校亮起来

陈经纶中学1921年由日本友人清水安三先生创建，并于1991年由香港爱国人士陈经纶先生捐资改建。学校的西班牙式风格建筑别具特色，校园环境优雅宁静。建校80年之际，学校将镌刻着安三先生教育名言的石碑矗立在美丽的校园之中，将陈经纶亲笔题字的汉白玉雕刻的楼名镶嵌在楼壁上，新建了带喷泉和彩灯的校园文化广场。典雅的建筑与壮观的操场相映衬，铺在地上的劝学篇，立体的校徽雕塑，科技画廊、艺术雕像和壁画，以及学生的活动剪影、书画作品和绿化的点缀，多方位立体地营造了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

学校的现代化设备也一应俱全。学校装备了朝阳区目前最先进的校园网，八条光缆连接了学校十栋楼房，教师实现一人一机办公备课。为使学生享受满意的教育服务，学校将原来的阅览室分割为七个区域，即电子阅览区、期刊阅览区、独立学习区、互助学习区、交谈区、会议区、办公区，为42%的学生提供了同时阅览的机会，既满足了不同学生的不同需求，又大大提高了设备和设施的使用率。学校的图书馆全天开架借书、实验室对学生开放实验、体育组对学生开放全部器材、校园网对学生开放所有教育信息、体育场馆对学生开放、教师办公室和校长室对学生开放。开放的举措必然促进新的教学关系和教学模式在学校的诞生。[以下略]

(26) 「北京市朝阳区普通教育志」(谭烈飞主编『北京方志提要』中国书店2006年3月) 370~371頁。

[前略]／朝阳区位于北京城外东部，明清属京师顺天府，为大兴县辖，是落后的农业地区，教育非常落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京师督学局在朝阳门外开办京师第二初等小学堂，招收满旗子女入学，是本区办学之始。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学堂改为学校，招收五族学童入学。1921年日本侨民清水安三夫妇在朝阳门外碑楼胡同开办崇贞女子学园。1933年。当局推行义务教育，东郊的教育稍有发展。1939年，崇贞女子学园设初中部，是本区办中学之始。1942年，东郊区有公立、私立小学21所。1945年抗战胜利后，北平市教育局接收中小学，崇贞女子学园更名为“北平市立第四女子中学”。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区人民政府接管了公立中学1所，小学20所。[後略]

(27) 「清水安三（1891-1988）」(《鲁迅大辞典》编委会编『鲁迅大辞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2月) 1013頁。

日本神学家，中国文学和历史研究家。1915年在同志社大学神学部毕业。1919年作为神甫派到中国，先后在北京创立崇贞学园、爱邻馆，从事天主教宣传和宗教教育。1921年结识鲁迅。1922年撰写《中国当代新人物》，在日本《读卖新闻》上载了一个月，其中《周三人》一章评介鲁迅三兄

弟，是日本最早介绍鲁迅的篇章之一。1923年1月20日，鲁迅与清水等五人赴爱罗先珂和周作人设的晚宴。同年8月1日和翌年5月7日的日记中也有他们交往的记载。其间鲁迅曾用明信片题诗一首寄给清水安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佛教，立地杀人。”（《集外集拾遗补编·题寄清水安三》）1927年鲁迅移居上海后，他曾向鲁迅介绍过内山完造。1945年被遣返回国。归国后创立樱美林大学，任校长兼文学教授。1967年5月，写过回忆鲁迅的文章《值得爱戴的老人》，谈到鲁迅曾帮助他修改孔乙己的译文之事。著有《中国新人和黎明运动》、《中国革命史》、《中国人的心》等。

(28) 刘伟「1909年，鲁迅第一次在日本媒体上出现，迄今已过一百年。回顾日本的百年鲁迅研究，可从一个角度见证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行程——一百年，鲁迅研究在日本」（『人民日報』2010年3月2日）24面。

在日本，鲁迅始终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早在1909年，当鲁迅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留学生时，东京的刊物《日本与日本人》五零八号“文艺杂事”栏，便报道了当时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翻译、出版的消息。当鲁迅正式走上中国文坛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家青木正儿给予了最初的介绍，称鲁迅“是位有远大前程的作家”，他的《狂人日记》“描写一位迫害狂的恐怖的幻觉，达到了迄今为止中国作家尚未达到的境地”。之后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直至战前相继出现了丸山昏迷、清水安三、山上正义（林守仁）、佐藤春夫、增田涉、小田岳夫等人对于鲁迅著作的翻译和鲁迅生平的介绍。《鲁迅选集》《大鲁迅全集》等书籍的相继出版使鲁迅的作品在战前的日本就得到了广泛传播。在战时的1944年年末，竹内好的《鲁迅》作为一部日本鲁迅研究的奠基之作，它深刻而久远地影响了战后日本鲁迅研究，并逐步形成了以“竹内鲁迅”为根基的理论体系与思想传统。从五六十年代到70年代，经过尾崎秀树、丸山昇、竹内实、木山英雄、山田敬三、伊藤虎丸，以及近30年的丸尾常喜、藤井省三等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日本鲁迅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如从日本舆论界对鲁迅最初的文学活动的注意算起，迄今，鲁迅在日本已被言说了整整一百年。这百年间，中国的鲁迅研究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其间虽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辉煌，但也遭遇了90年代以来的冷落，现在则出现了后继乏人的局面。相对而言，日本鲁迅研究虽然时有起伏，而且到20世纪末热情也有所减弱，但是总体上看，基本上处于平稳发展的态势，即使是当鲁迅被政治图解和被某些中国人百般诋毁的时候，日本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仍然严守坚定的学术立场和严谨的科学态度介绍和研究鲁迅。为什么同一个鲁迅在不同的国度中，却有着如此相异的历史命运？在当下鲁迅研究处于困境的时期，日本鲁迅研究有哪些启示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这是回顾百年日本鲁迅研究需要我们认真总结的地方。

日本的鲁迅研究从来都是作为一项独立的学术活动，因此，科学、严谨成为他们共同的信念与追求。像竹内好，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情势下，依然是从个人的生命体验出发，独立和超越于战时政治需要之上，用生命和心灵感悟和解读鲁迅。《鲁迅》是竹内好在即将被派往中国战场之前写下的，深层的写作动机包含着对日本战时下文学为战争服务的文学现状的殊死抵抗。在生与死的临界点上，他沉潜入鲁迅的精神内面，以对鲁迅思想中的悖论的发现和解明，写下了被称之为“近似遗书”的《鲁迅》，创造性地提出了诸如“文学与政治”，鲁迅的“回心之轴”、“挣扎”、“抵抗”、“拒绝政治的政治性”等众多命题，至今深远地影响着日本的鲁迅研究。

当然，日本历史上也有过因政治原因而导致对鲁迅的误解。在中国，曾经很长时期里出于一种

纯粹的政治需要，鲁迅常常被绝对政治化、工具化和简单化，而鲁迅作为文化巨匠的文化内涵与品格和作为文学家的文学色彩与内蕴却往往被淡化和忽略了，使鲁迅研究陷入于单纯政治化的范畴之中。但是，在日本，不论是来自中国的还是日本自身的政治运动与思潮，都为日本鲁迅研究提供了促其成熟和获得独立自觉的外部刺激和反面借鉴，使真正有良知的学者、文人始终坚守研究的独立性、纯洁性和学术性。像丸山昇从不盲从于任何权威、教条和政治形势，惟一认定的只是事实本身，主张以鲁迅史实为基础，坚持科学、求实的态度，从鲁迅思想的发展中研究鲁迅，开辟了实证研究的先河，对鲁迅思想的转变特别是后期思想发展的研究做出了重大突破。显然，坚持和捍卫鲁迅研究的独立性，既是日本鲁迅研究不受外界干扰，保持长期稳定发展的秘诀之一，也是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学术的独立并不等于与政治绝缘，更不意味着逃避现实，日本鲁迅研究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一方面与社会现实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不完全受制于既定的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支配，具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性和超越性；但另一方面又与社会现实和政治紧密相连，表现出了强烈的批判性与现实性。战后日本鲁迅研究的动机之一，就是站在对日本“疑似近代”的反省的立场上，通过鲁迅看待“真正的近代”。竹内好写于1948年的《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就是借助鲁迅和中国作为反省和批判日本近代的内在力量。他将日本与中国加以对比，把中国和日本在接受西方近代文化的方式区分为“回心型文化”与“转向型文化”，批判了近代日本的优等生文化，把它视为一种失去主体性的“奴隶”文化。他肯定了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的“抵抗”，也就是“抗拒为奴”的精神，而最能代表这一精神的，在他看来，就是鲁迅。正是从鲁迅那里，竹内好找到了对日本的主体性进行审视和反思的一面镜子，主张通过现代中国这个媒介实现自我否定，并由此展开对亚洲的近代化问题的思考，以促成新的文化自我生成。丸山昇和伊藤虎丸等人继承了竹内好的强烈的现实感和反省意识为核心的主体精神的自觉，他们从鲁迅身上，也从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当中意识到只有通过“回心”式抵抗才有自我变革和发展，才能实现主体性真正的确立。鲁迅构成了借以反省和批判日本的近代和“战后民主主义”的重要媒介和重建亚洲主体性的思想资源。

在当下鲁迅研究日益趋于“古典化”和边缘化，不再与当代生活构成对话关系时，竹内好等人的方法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进入历史并将文学与现实连通的路径，它所启示的就是在对当代思想与文化的观照和批判中，将鲁迅研究介入到社会变革和文化建设里面去，重返当代思想与文化的前沿，构建一种与时代充满弹性与张力的鲁迅研究的生存机制与功能体系。

学术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地创新，日本鲁迅研究的百年历史就是一个不断挑战自我和超越自我的历史。正是在对小田岳夫和增田涉及战前日本鲁迅研究肤浅理解的批判与挑战的基础上，竹内好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与方法，并作为一种精神资源被有效地注入到战后日本鲁迅研究中。但是，日本学者在继承的同时，并没有把竹内好的鲁迅研究奉为终极性的完成，而是不断发起新的挑战与批判。比如丸山昇就是试图以历史主义的方法纠正“竹内鲁迅”强烈的“玄学”品格，还原了鲁迅“革命人”的一面，用“革命人”把“文学者”与“启蒙者”统一起来，以克服竹内好的二元论，相对于竹内好直觉式的哲学性研究，采取严密的逻辑实证分析，拓展和深化了认识鲁迅的思维空间。伊藤虎丸比较注重鲁迅思想与文学生成的历史性与现实性，在吸收竹内好思想成果的同时，以“终末论”来深化竹内好的“回心”和“文学的自觉”，并用“欧洲近代的‘个’的思想”观念来统一“文学”和“启蒙”的矛盾关系，在对鲁迅留日时期思想的形成跟当时日本流行的西欧思想和文学之关系的探讨中，提出了“原鲁迅”命题。

近20年来，日本鲁迅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愈来愈趋于向外转的倾向，并开始从政治研究向文化研究过渡，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新格局，而这一切，同样深蕴着竹内好的巨大影响和超越竹内好影响的不懈努力，也是竹内好所主张的“在发展中来把握鲁迅”，通过自我否定鲁迅这一象征来从鲁迅身上无限地生发新的自我，发现新的来自于鲁迅的思想动力和精神能源。这就是时隔一个世纪，日本鲁迅研究始终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根本所在，也是值得中国学者认真思考的重要启示。／（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29）刘柠「日本友人眼中的李大钊」（『东方早报』2011年11月27日）B13面。

据日本学者石川祢浩的研究，大约在1920年前后，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成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理由是：“李大钊在1919年下半年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翌年1月写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里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及‘经济决定论’尚存有疑问，而在1920年，他就消除了对唯物史观的怀疑……李大钊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纽带，也与他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一样更加强化起来。”（《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石川祢浩著，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2月版，18页）

所谓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纽带”，是指1920年底，李大钊加入了社会主义者大杉荣、堺利彦等在东京成立的“日本社会主义同盟”。据现存日本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的该同盟的花名册显示，有几位会员的名字疑似中国人或朝鲜人，但著名者只有李大钊。另一位当时滞留北京的日本人会员是丸山幸一郎（1895-1924，笔名丸山昏迷、昏迷生），是当时的日文报纸《新支那》和《北京周报》的编辑、记者。石川认为：“可以肯定地说，介绍李大钊加入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的就是这位丸山。”（《中国共产党成立史》，20页）

丸山昏迷在北京的日本人圈子里很有名，有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资源，其本人的名字，也曾鲁迅日记和周作人日记中多次出现。当时也住在北京的日本著名教育家、樱美林学园的创立者清水安三（1891-1988）回忆说：“最早接触北京的思想家和文人的，实际上是丸山昏迷君，许多日本的思想家和文人来游，都是丸山昏迷君陪他们到周作人和李大钊先生家里去的。说实话，我自己也是该君陪着去拜访周作人和李大钊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18页）

清水其实与李大钊是老相识，早在李留日时期，便曾登门拜访过他。当时是通过另一位丸山——丸山传太郎牧师的介绍，李大钊就住在这位丸山牧师所开设的丸山学寮里。学寮位于山吹町，离李就读的早稻田大学很近便。两层小楼，面积不小，约有四十坪（日本传统面积计量单位，一坪约等于三点三平方米），住着几名中国留学生，身穿立领学生服的李大钊是其中一位。每逢周日，便在楼上两间相通的房间里举办主日聚会活动，日本学生总有十数人参加。清水印象最深的是，唱赞美歌的时候，李大钊弹管风琴为大家伴奏：“看着这位日后的共产主义者‘大物’，在周日学校里弹奏赞美歌，那真是有趣的光景。然而过去的信主之人，却转向成了社会主义者。”笔者从未见过对早年李大钊皈依基督的记录，但早稻田时代，李确实曾修习过著名基督徒教授阿部矶男的社会政策课程。

多年后，清水再次见到李大钊，是在北京大学教授陈启修做东的、为日本客人接风的宴会上。七八个人，都是从日本回来的“海龟”，因为是欢迎日本人，所以宴会上大家都说日语。久别重逢，不胜唏嘘。两人的距离一下就拉近了，从此过从颇密。

清水去李大钊家，即使没有二十次，也有十四五次，他说：“那时候，我经常和丸山昏迷君、铃木长次郎兄一起去拜访他，他的家是我们在北京最愉快的去处之一。”李大钊家位于在《鲁迅日记》中屡屡出现的山本医院附近，西单往北，第一个或第二个胡同向西拐，一间朝北的屋子。中等人家的模样，与陈启修、胡适的宅邸相比，朴素得多。门柱上有孔，孔里穿着铁丝，铁丝的先端系着一块小木牌，一拉木牌，便响起“叮铃铃”的铃声。

清水跟李大钊用日语交谈。李的日语虽然不像鲁迅那样流畅，倒是都明白。跟李夫人说话，清水则用中文。夫人是李十岁时，奉父母之命娶的童养媳，年长李大钊六岁，是一个很普通的女性。在清水眼里，李大钊是一个像日本乡下的村长一样平凡可亲的人。“他静静地说着话，不是那种双目炯炯、慷慨激昂的类型。即使谈左翼的话题，也绝不激动。他不会让对方感到紧张，相反，是一个能让人松弛的、什么都能聊得来的人。”（《清水安三回忆李大钊》，见《复活之丘》1982年3月1日号）所以清水不仅自己再三再四造访，有时还带朋友一块过去，引荐给李大钊，如政治家鹤见保祐辅和一桥大学教授、经济学者福田德三等。

有两个细节令清水安三记忆犹新。一是李大钊甚喜日本的吃食，尤其是和菓子（一种日本甜点）和日式馒头，经常从东单的日本店里购买。偶尔清水也买些日本食品作为礼物带去，深得主人欢心。二是李大钊的阅读量大令人吃惊。罗素访问中国时，清水只读过其《自由之路》、《形而上学》和《哲学问题》等三部著作，他却把其所有的著作都读过一遍，而彼时很多书根本未译成日文。李大钊还用英文读了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他固然是读书家。但与其说是学者，不如说是活动家一类的人物，具有能让青年献出生命的人格魅力。”（清水安三：《李大钊之死——其思与人》）

清水与李大钊相识相知多年，私交莫逆。李大钊爱读日文书报，常从东单三条附近的面向日本人的东亚书局购书，可那里毕竟店小品种少，殊难满足需要，有时便托清水从东京的书店订购。清水曾自掏腰包为李大钊从日本国内订阅过堺利彦主办的左翼报纸《平民新闻》。共产主义者、前日共委员长佐野学从国内流亡到北京时，起初由中江丑吉照应，但旋即便难以藏身，清水托李大钊帮忙，李遂安排佐野经天津逃往苏联。佐野从北京站出发的那天，李大钊特意派一个青年送行到天津。那青年身材颀长，穿着硬撅撅而又肥肥大大的衣服。多年后，清水听说当年在李大钊的斡旋下，毛泽东曾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事情，不禁突发奇想，觉得那青年有可能就是毛泽东，不过似乎时间不甚一致。

1924年，清水赴美留学。行前去向李大钊告别，李托他在美国搜集些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大概由于若是书的话，可以订购，而这种小册子是非卖品，在中国很难入手的缘故吧。刚好京都的西阵教会有两名牧师先期留美，其中一位叫浅野的，在芝加哥转向为共产主义者，于是便托这位浅野牧师搜集了一批，然后再由清水设法寄给李大钊。清水后来回忆说，不成想赴美学神学的自己，为了友情，竟“僭越”至此。

两年后，清水从美国再次回到中国，正值国民革命开始北伐，因作为《读卖新闻》、《北京周报》的特派员南下，而错过了与李大钊重逢的机会。1927年3月初，清水曾致信李大钊，力陈藏身东交民巷苏俄大使馆之不靠谱，劝其南下，但他很可能未收到此信。

清水回到北京，便接到了李大钊惨死的噩耗，心如刀绞。“是夜，我无论如何无法入眠，往日的会面历历在目，不禁失声号泣。阿道夫·哈纳克说，只要翻开历史，便可见文化的街头必立着鲜血淋漓的殉教者的墓碑……”李大钊牺牲两周后的5月8日，清水在《北京周报》上发表了《李大钊之死——其思与人》一文，痛悼亡友。

作为日本人，清水看到李大钊死后，其夫人对何谓革命、为何牺牲等问题似乎很茫然，只是说“守常迷信共产”，哭个不停，他为李夫人不能像何香凝夫人那样以凛然的态度，面对并礼赞丈夫的死而略感遗憾。

清水安三是战前一代“支那通”，精通中文，在中国生活逾十载，交游甚广，人脉遍布社会各个阶层。在他的眼里，伟大者、威严者、霸气者所在多有，但李大钊作为青年时代便结识的诤友，始终是一个亲切、随和、老成持重的东洋“村长”形象。乃至他多年后翻阅中国大陆出版的关于李大钊的传记和党史材料时，大感意外，与自己早年的印象无论如何对不上号。他自己的解释是因为李是毛泽东的老师（指北大时代，李大钊做图书馆馆长时，毛为图书管理员），因弟子的“伟大”而“伟大”。在清水的印象中，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的陈独秀是个人物。也许是年长者的缘故，“是很难亲近的了不起的人。霸气满满，相貌堂堂，让人不得不在他面前恭恭敬敬、彬彬有礼。跟与友人很容易熟络亲热的李大钊相比，感觉真不是一个档次”。“可要说真正的大人物，无论如何当推鲁迅。那种伟大的人物，我想日本是出不了的。虽然缘慳一面，毛泽东恐怕也属此类。至于李大钊这一级的人，日本应该也有不少吧。”（《清水安三回忆李大钊》）

(30) 新京报记者·朱桂英「清水安三、朝阳门外的贫民教育家」（『新報』2012年6月30日）C 6面。

如果一个人内心明亮，坚执善念践行一生，那么他身上就有一种迷人的东西，在关乎人性的力量与善的界域内，独自生辉。清水安三的一生，正属于这样的故事，年轻时，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声，从日本来到中国，带着“为中国做点什么”的简单信念，投身贫民启蒙教育，最后因日本战败被迫离开，近三十年的耕耘，留下一座崇贞学园（即现在陈经纶中学的前身），学校几易其名，多年之后终究鲜为人知。

清水安三（1891-1988）

出生于日本滋贺县，中学时代皈依基督教。大学时代了解到鉴真大师的事迹，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7年清水安三进入中国进行传教活动，1921年在北京设立崇贞学园（今北京市陈经纶中学的前身）。2006年在崇贞学园建校85周年之际，陈经纶中学内竖立清水安三的塑像。

小石子的启悟

清水安三生于1891年，父亲早逝，家道中落，长兄主事不力，且因一场激烈缠绵的情事，累及全家的物质生活，以致安三的少年时代充满压抑与不安。1904年，他出门远行参加中学入学考试，母亲在他随身携带的柳条筐里准备了两套衣服，和服与学徒服，告诉他考上就穿前者，考不上穿后者。所幸，和服得选。

安三的中学英语老师沃利慈，是来日传教的美国基督徒，二十几岁的年轻传道士，在异国他乡以理想为马，温柔乐观，安三被他深深吸引。沃利慈不久因热心传道，忤于当局，失去教职，仍挫而不馁。一次，安三与沃利慈同游郊区，身无分文的沃利慈手指一片空山谷，计划将其买下建疗养院，安三内心大动。

中学时代的安三，成绩不佳，自卑之心甚重。受洗成为一名基督教徒后，他受启于圣经故事中小石子的形象，即便最卑微的东西，有信有爱，就有奇异荣光，于是将自己当做是一颗小石子，相信自己也可以有所作为，以此褪去自卑。之后他认真帮助那些与自己一样学习成绩不佳的中学生，

发现自己虽学不及人，但教有所长，很受激励。

1917年6月，安三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沈阳。虽是信靠神爱，他依然不够聪明，在沈阳的第一场演讲中，他说要把中国建成美利坚共和国那样的国家，认为日本人应该担负美国建国时代的清教徒所担任的责任，如有必要不惜与日本一战，如此等等，极具社会想象力，政治判断极乱，倒也有语惊四座的效果。

之后他的政治判断力似乎未见提高，二战乱世，他也没搞清中日两国各自的立场与利益所在，唯信和平同兴。不过，省下思考政治时局的心力，用来专心做教育，也不失为好事。

在沈阳两年，安三完成自己的婚事，成功开办了一个免费儿童馆，内设秋千滑梯等游乐玩具，他每天在口袋里装上梳子、卫生纸，随时准备给孩子们梳头擦鼻涕，心里想着游乐园可能发展成幼稚园、学校……这些，他最终都实现了。

朝阳门外的彩虹

1919年安三被教会派遣到北京，身处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近距离感受中国现代转变的时代脉动，照理该是别有一种阔大与入情。但安三自己文章里却是说，因为日本同道都拼命学习，自己汉语功底很差，不得不也拼命学习，所以读了康有为、孙中山、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人的大量作品，即，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踏入对中国思潮的研究。很朴实有趣的逻辑，在安三那里就是真实，从真实本分出发，不涉玄理大义。

关于1919年，我们习以为常的记忆，停留在五四运动，但其实这一年春夏之交华北大部分地区就出现了旱情，到1920年春秋两季，旱情更加酷烈，最终引起华北五省特大灾荒。1920年9月初，《申报》、《大公报》有专题报道，以哀鸿遍野描述灾情，报道说有举家无法图存而阖门自尽者。

安三在灾情还没有加剧时，就着手准备救援工作，他以书信面谈，说服日本权势人物出资支持自己救灾，及时开设灾童收容所，驾着驴车一个个村寻找，把濒临饿死边缘的农民孩子集中起来收养，到麦子收期再让他们返家。1921年春天风调雨顺灾情减除，但部分孩子无家可归，安三为此创立了一个孤儿院，之后在此基础上开设了学校。

五四前后，也是世界妇女运动的高潮之时。但长久以来处于社会弱势阶层的女性，若无一技之长安身立命，仍是无法获得权利与尊严。安三对新时代女性的独立充满期待，但在北京的朝阳门外，他却发现了夜幕掩盖下的性交易，10日元的贞操价格，让他震惊，他想到了办工读学校，女生可以在学校里既可工作赚钱也能学习，阻止贞操买卖。

学校建立之后，取名崇贞，以老实、宜强为训，办学宗旨为“学而事人”，落址朝阳门外。作为校长的安三，既要负责各处募捐筹集资金，也负责将学生们做的刺绣工件推销出去，四处奔波，苦心经营，亦乐在其中。彼时朝阳门外为贫民聚集地，工读学校免费学习还能赚工资，对很多家庭来说，将女儿送去崇贞，是为上好选择。即便在抗战爆发排日情绪浓烈时，崇贞学园对于底层家庭的魅力并未消退。

安三为学校所作的校歌中，有“教育平等是平权，空说解放亦徒然”一句，学校宿舍入口的门上，刻有“微笑微笑教而学，不损天赋是教育”。他甚至希望自己的学校能培养出一批中国妇女节的领袖人物来。

但1945年因日本战败，崇贞学园收归中方，相关资料尽毁，其学生最后的流向尚未有人整理，桃李之绩不曾清晰呈现。根据学校设置，学生在崇贞毕业之后送往日本的教会大学留学，学成之后，所为即是“事人”，落于平民阶层，如水濡沙，尽一己之力，若作推测，该是很少以高大光辉形象

显影历史舞台。

单纯的中国通

作为基督徒的安三，理所当然地认为和平具有绝对的价值，超越利益与权力，中日开战的阴云渐浓，他和妻子开始行动，希望说服有影响力的人行动起来阻止战事。

1936年1月3日，胡适在日记里写到：“日本人清水安三夫妇同寺田喜治郎（沈阳中学校长）来谈，我很不客气的同他们谈中日问题的各方面”。之后转笔叙述其他事情，对于清水安三为何人，未做任何说明。

两国交战，涉及各种复杂因素，非单纯美好意愿可左右。清水安三的游说，除了让他自己觉得内心无愧之外，别无他效。从胡适日记的口气来看，安三的行为已招致反感，然而他自己却没有意识到。抗战暴发后，安三回忆这次会面，为自己口才不佳未能说服胡适而痛心，仿佛他对这场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据安三文回忆，当时胡适还为他写了一幅字“忘也忘不了，放也放不了，刚忘了昨儿的梦，又想起梦中一笑。”这是胡适于1924年写的小诗《烦闷》，胡适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此诗与胡适爱而不得的情事有关，很难猜测胡适写这首诗给安三，意在何处，安三自然也是稀里糊涂，而胡适对此只字未提。

抗战爆发后，安三并未听从日本驻华使馆的撤离之令，仍在学校主事，并热心和平游说。他在炮声中立愿，万一被流弹击中身亡，希望在崇贞学园立墓碑，他为自己想好的碑文是：“跨越国境涓流之真清水，手捧黄土献给芳草之园”。幸好北京未成为战场，学校正常运营至1945年。

在中国期间，清水安三与当时中国名流诸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胡适都有过交往，也曾与蒋介石会面，他把相关见闻叙于文字刊发在日本境内的报纸，被日本国内人士当做是中国通，安三的稿费收入则用于学校。

离开中国后，清水安三在日本继续办学，白手起家筑成樱美林大学。中日恢复正常交往之初，安三受邀访问中国，但他沉思良久，最终还是拒绝了。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的确据。他们都怀有信心而死去，虽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但却都远远看见——这些是清水安三最爱的圣句。

(31) 彭定安「鲁迅：20世纪中国的民族文本」（『光明日报』2013年9月30日）5面。

[前略]／鲁迅的文学作品就是一种表达民族精神、民族命运和民族愿望的民族文本。我且先从读者接受方面来加以证实，以为直接论证的准备。

在中国的鲁迅接受史中，一代代读者从鲁迅作品中期盼也确实获得的是对民族命运的关怀、对人民自由解放的追求、对敌人的恨和对人民的爱。其中，包含对于中国历史的深刻感知、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刻体认和对于中国国民性的切肤感受。与这一切紧密联系的，还有培育了中华民族在救亡图存中最需要的爱憎分明、坚贞不屈、锲而不舍的精神品格。几代中国人，在鲁迅作品和鲁迅精神以及鲁迅品格的哺育下成长；鲁迅的深刻影响，对他们的成长和成就所发生的重要作用的众多事实，成为鲁迅作品是20世纪中国的民族文本的最有力而切实的证明。

国外的鲁迅接受也是如此。国外的读者和研究者，读鲁迅，就是读中国；研究鲁迅，就是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研究中国。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日本，他们很早就提出了鲁迅文本的社

会改革意义，以及为此而具有的社会批判的品性。从1921年第一个向日本推介鲁迅的清水安三赞扬鲁迅痛苦地“诅咒了真正黑暗的人生”“一股脑地将中国的旧习惯和风俗加以咒骂”。后来，山上正义又指出：“（鲁迅）以阿Q这个农民形象为中心，描写了中国农村、农民、传统、土豪和劣绅。特别是描写了他们和辛亥革命的关系，一言以蔽之，它深刻地描写了这次革命的实质到底是什么。”这些评论，把鲁迅文本同现实的中国、中国社会和它的“国民革命”的实质联系起来，指出了鲁迅文本深刻的民族性和革命意义。更具深刻意义的是，第一本《鲁迅传》的作者小田岳夫，把鲁迅与孙中山相提并论，指出鲁迅是“可以和孙文匹敌的重要人物”。鲁迅着意于“人民从心灵的迟钝中解脱出来”，鲁迅是“绝望的，愤怒的，不屈的和忧郁的”，他的痛苦“远胜于孙文”。小田岳夫进一步深化到鲁迅文本作为民族文本的思想文化和心灵改革的层面。／〔後略〕

肆、清水安三に言及した中国語論文目録（稿）

（1）1980年代まで

001. 戈寶權「青木正兒論鲁迅」、《社會科學戰線》1978年第1期、1979年3月。
002. 戈寶權「談鲁迅“以日文譯自作小説”的發現」、《讀書》1979年第7期、1979年4月。
003. 唐弢「書城掠影——日本紀行之一」、《國外社會科學》1980年第2期、1980年3月。
004. 陳漱渝「關於日文《北京周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0年第1期、1980年4月。
005. 鄧嘯林「最早向美國評介魯迅的美國人」、《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第3期、1981年6月。
006. 戈寶權「魯迅與世界文學」、《中國社會科學》1981年第4期、1981年7月。
007. 嚴紹（湯玉）「日本魯迅研究名家名作述評（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1年3期、1981年10月。
008. 嚴紹（湯玉）「日本魯迅研究名家名作述評（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2年2期、1982年7月。
009. 劉福勤「魯迅藝術美學思想的成功實踐——論《阿Q正傳》的成因」、《蘇州大學學報》1984年第1期、1984年2月。
010. 山口一郎「日本人的孫文觀、孫文研究的特色與課題」、《孫中山研究述評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1985年3月。
011. 陳漱渝「東有啟明 西有長庚——魯迅與周作人失和前后」、《魯迅研究動態》1985年第5期、1985年5月。
012. 韓一德「李大釗與《北京周報》」、《歷史教學》1985年第7期、1985年7月。
013. 陳漱渝「東有啟明 西有長庚——魯迅與周作人失和前后」、《齊齊哈爾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1期、1986年3月。
014. 長弓「魯迅與山本忠孝——兼談魯迅的避難生活」、《魯迅研究動態》1986年12期、1986年12月。
015. 胡適遺稿・本刊資料室「五十年前胡適的日記（一）：紀念胡適之先生逝世二十五週年」、《傳記文學》第50卷第2期、1987年2月。
016. 森正夫「李大釗在早稻田大學」、《齊魯學刊》1987年1期、1987年3月。
017. 丸山昇「魯迅研究在日本」、《紀念與研究》〔上海魯迅紀念館〕、1987年4月。

018. 耿易「陳獨秀與辛亥革命」、《杭州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2期、1987年5月。
019. 武鷹「談日本學者對中國現代作家作品的評論」、《齊魯學刊》1987年第2期、1987年5月。
020. 唐弢「關於周作人」、《魯迅研究動態》1987年第5期、1987年5月。
021. 武鷹「用文藝來溝通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感情—日本學者對中國部分現代作家作品的評論」、《外國文學研究》1987年第3期、1987年10月。
022. 劉其奎「近代日本對華文化事業」、《史林》1988年第2期、1988年7月。
023. 韓一德「李大釗留學時期史實和思想軌跡的考索」、《北京社會科學》1988年第3期、1988年9月。
024. 趙京華「榮辱毀譽之間—全國解放前周作人研究述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8年第3期、1988年9月。
025. 韓一德「李大釗留學日本時期的史實考察」、《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1989年3月。
- (2) 1990年代
026. 丸山昇「日本人與魯迅—與介紹史方面有關的筆記」、《棗莊師專學報》1990年第1期、1990年4月。
027. 金安平「近代留日學生與中國早期共產主義運動」、《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2期、1990年5月。
028. 吳作橋「試論魯迅文學的世界影響」、《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2期、1991年5月。
029. 松井博光「中國現代文學在日本—譯介綜述」、《新文學史料》1991年第2期、1991年5月。
030. 張杰「日本的魯迅研究(一)」、《魯迅研究月刊》1991年第7期、1991年7月。
031. 沈寂「陳獨秀留學問題再考」、《安徽史學》1992年第4期、1992年8月。
032. 李明非「清水安三先生與中國—幾多鮮為人知的往事」、《外國問題研究》1992年第3期、1992年9月。
033. 王曉秋「五四運動與日本進步輿論」、《第二屆近百年中日關係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1993年1月。
034. 傅小北「唐弢年譜」、《新文學史料》1993年第1期、1993年2月。
035. 林衛國「梁延武的旅日生涯」、《滄桑》1993年第2期、1993年7月。
036. 劉予葦「留學日本時代的李大釗」、《中國民航學院學報》1993年第Z1期、1993年7月。
037. 邢麗雅「日本人的五四觀之我見」、《齊齊哈爾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4期、1993年8月。
038. 藤井省三「中國語教室里的魯迅—大正時期和昭和初期的漢語教育與對中國現代文學的接受」、《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4年第2期、1994年5月。
039. 文玉「魯迅研究領域的新拓展—“世界文學中的魯迅”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社會科學戰線》1994年第5期、1994年10月。
040. 萩野修二「日本關於冰心的介紹—清純的力量」、《日本研究》1994年第4期、1994年12月。
041. 江黎「一座宏偉的中日文化交流殿堂的全景觀、多層面、動態感的理性再現—評彭定安主編《魯迅：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坐標上》」、《魯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3期、1995年3月。

042. 陳漱渝「魯迅・周作人・胡適」、《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1期、1995年3月。
043. 袁荻涌「國外魯迅研究一瞥」、《攀枝花大學學報》1995年第4期、1995年11月。
044. 馬蹄疾「一九二二年魯迅交往日人考」、《新文學史料》1996年第2期、1996年5月。
045. 李鐵虎「日偽統治時期北平中等學校一瞥」、《北京黨史研究》1996年第4期、1996年7月。
046. 張福貴「戰前日本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評介」、《社會科學戰線》1996年第5期、1996年10月。
047. 袁荻涌「國外魯迅研究一瞥」、《宜春師專學報》1996年第6期、1996年12月。
048. 孫郁「“被近代化”的文化互證」、《讀書》1996年第11期、1996年11月。
049. 李思樂「魯迅寄給清水安三的一張明信片」、《魯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11期、1996年11月。
050. 泉彪之助「回憶魯迅和上海內山書店—內山正雄、兒島亨、內山芳枝採訪記」、《上海魯迅研究》9、1998年9月。
051. 映象「唯大英雄能本色—我讀辜鴻銘」、《長江文藝》1999年第5期、1999年5月。
052. 唐政「魯迅與日本作家友人三題」、《魯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5期、1999年5月。
053. 韓一德「李大釗留學日本時期的史實考察」、《李大釗研究論文集》、1999年6月。
054. 言恂「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一瞥」、《常德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5期、1999年10月。

（3）2000年代

055. 野澤豐「懷念劉大年先生—相識日本與重逢中國及其他的追憶」、《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2000年11月。
056. 丸山升「日本的魯迅研究」、《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1期、2000年11月。
057. 楊念群「“辜鴻銘現象”的起源與闡釋：虛擬的想象抑或歷史的真實？」、《浙江社會科學》2001年第2期、2001年4月。
058. 徐靜波「松枝茂夫的中國文學緣」、《中國比較文學》2001年第4期、2001年10月。
059. 靳叢林「冷漠的觀照：五四新文學到日本」、《魯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10期、2001年10月。
060. 于耀洲「日本社會對五四運動的態度簡析」、《史學集刊》2001年第4期、2001年11月。
061. 陳漱渝「盛世修書—對於修訂1981年版《魯迅全集》的幾點意見」、《蘭州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2002年4月。
062. 張耀杰「北大講義風潮與魯迅的不稱職」、《粵海風》2002年第3期、2002年6月。
063. 鍾兆云「解讀辜鴻銘」、《書屋》2002年第10期、2002年10月。
064. 泉彪之助「山本忠孝—魯迅在北京時的主治醫」、《魯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10期、2003年10月。
065. 郎紹君「豆村梁樹年和他的藝術」、《榮寶齋》2004年第2期、2004年3月。
066. 王中忱「上帝兒女的國籍—讀山崎朋子《朝陽門外的彩虹》」、《書城》2004年第9期、2004年9月。
067. 黃喬生「魯迅、周作人比較研究片論」、《上海魯迅研究》2005年S1期、2005年4月。
068. 顧農「魯研叢札（下）」、《上海魯迅研究》2005年第1期、2005年5月。
069. 顧農「最早的魯迅研究資料集—《關於魯迅及其著作》」、《新文學史料》2006年第1期、2006年2月。

070. 石岡陶子「李大釗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來源之中日比較研究」、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4月。
071. 吳俊峰「藤樹的儒學受容」、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4月。
072. 周朗生「尋求秩序」、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4月。
073. 穆潔「做一名勇于踐行的校長—訪北京陳經綸中學校長張德慶」、《中小學管理》2006年第11期、2006年11月。
074. 楊早「魯迅對於日本的意義—以“竹內魯迅”為中心」、《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6年第4期、2006年12月。
075. 散木「讀書識小及獻疑一二」、《博覽群書》2007年第4期、2007年4月。
076. 無記名「李大釗：盜來“天火”的人」、《青年與社會》2007年第2期、2007年6月。
077. 朱洪秋「構建校本德育亞文化」、《中小學校長》2007年第11期、2007年11月。
078. 張德慶「加強學校文化建設 提升學校德育品位」、《北京教育（普教版）》2008年第2期、2008年2月。
079. 宋揚「論伊藤虎丸的魯迅研究」、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08年4月。
080. 王華「從接受理論看辜鴻銘《中庸》英譯」、湖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5月。
081. 李雪「新文化運動時期魯迅的譯介活動」、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5月。
082. 王林紅「周作人的日本情結」、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6月。
083. 朱洪秋「生活即教育，社會即課堂，人生即遠足—北京市陳經綸中學“人生遠足”教育活動紀實」、《思想理論教育》2008年第12期、2008年6月。
084. 劉磊「唯物史觀視野下的毛澤東與梁漱溟農民觀比較研究」、昆明理工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10月。
085. 元青「北洋政府時期的留日學人與中國文化的對日傳播」、《廣東社會科學》2009年第1期、2009年1月。
086. 徐炳三「日本基督教會戰爭責任初探」、《抗日戰爭研究》2009年第1期、2009年2月。
087. 靳叢林「戰前日本魯迅研究概觀」、《外國問題研究》2009年第1期、2009年3月。
088. 劉永生「五四時期社會文化思潮考察—以湖湘思潮為例」、《求索》2009年第3期、2009年3月。
089. 靳叢林「竹內好的魯迅研究」、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4月。
090. 李謙「五四時期的胡適與馬克思主義」、河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5月。
091. 方厚升「《西方的沒落》與辜鴻銘」、《中國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3期、2009年6月。
092. 衡朝陽「李大釗和中國早期社會主義的研究回顧」、《黑龍江史志》2009年第12期、2009年6月。

（4）2010年代

093. 無記名「讓經綸成為學生自主成長的人生舞臺—北京市陳經綸中學豐富多彩的校園生活」、《教育科學研究》2010年第2期、2010年2月。
094. 孟建煌「論離臺內渡臺灣進士施士潔與日本文人」、《海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2期、2010年3月。

095. 章莉「後殖民視域下辜鴻銘的儒經英譯」、浙江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4月。
096. 陳力君「師者與他者—魯迅筆下日本形象之鏡觀」、《學術月刊》2010年第7期、2010年7月。
097. 靳叢林・李明暉「竹內好與他的時代」、《上海魯迅研究》2010年夏、2010年7月。
098. 藤井省三「日本人對現代中國的解讀—20世紀中國文學閱讀史」、《揚子江評論》2010年第4期、2010年8月。
099. 廖濟忠「梁漱溟倫理思想研究」、中南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12月。
100. 林清峰「“中國近代最有趣的人物”—辜鴻銘」、《文史月刊》2011年第1期、2011年1月。
101. 徐靜波「金子光晴的上海游歷及與中國文壇的交往」、《中國比較文學》2011年第1期、2011年1月。
102. 同道「國學大師之死」、《時代文學（下半月）》2011年第1期、2011年1月。
103. 江棘「魯迅外文藏書提要（二則）」、《魯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1期、2011年1月。
104. 齊宏偉「論魯迅“幽暗意識”之表現及由來」、《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期、2011年1月。
105. 劉偉「中國現代文學的日本傳播」、《社會科學家》2011年第2期、2011年2月。
106. 阿信「挖掘魯迅與基督教精神資源的關聯」、《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6號、2011年2月。
107. 成然「魯迅研究在東亞文化交流中的資源價值」、《大連民族學院學報》2011年第2期、2011年3月。
108. 李超「日本學者對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思想的影響」、蘭州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4月。
109. 王升遠「戰爭期間日本作家筆下周作人的實像與虛像（中）—以魯迅為參照：冷靜、溫和的“愛國者”與文壇宿將」、《魯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3期、2011年4月。
110. 經晶「互文性視角下的辜鴻銘之《中庸》英譯文本研究」、廣西民族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5月。
111. 趙牧「書信・日記・自述：魯迅與宮竹心（白羽）交往考釋」、《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2011年5月。
112. 付蘭梅「凝眸“過渡人”的文化臉譜」、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11年6月。
113. 岳金龍「王占元與乾義面粉公司研究」、河北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6月。
114. 王升遠「戰爭期間日本作家筆下周作人的實像與虛像（下）—“親日派”周作人形象在日本的生成機制及其與文學譯介之關聯」、《魯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5期、2011年6月。
115. 劉偉「二十世紀日本魯迅研究的三次轉向」、《大連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期、2011年6月。
116. 蔣金晶「魯迅的文化傳播實踐及其文學思想的當代價值」、湖北民族學院碩士論文、2011年6月。
117. 徐靜波「日本中國文學研究會始末及與中國文壇的關聯」、《新文學史料》2011年第3期、2011年8月。
118. 宋紹香「世界魯迅譯介與研究六十年」、《文藝理論與批評》2011年第5期、2011年9月。
119. 李麗君「郁達夫1936年訪日新史料—近年日本外務省解密官方檔案考」、《現代中文學刊》

- 2011年第5期、2011年10月。
120. 杜光霞「待宰的圖騰與逃遁的自卑—周氏兄弟失和原因新探」、《魯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12期、2011年12月。
121. 徐炳三「侵華時期日本宗教團體的政治態度—以基督新教為例」、《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2012年1月。
122. 熱妮姬「魯迅和契訶夫短篇小說語言風格比較研究」、長春理工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3月。
123. 孫江「橘樸與魯迅」、《讀書》2012年第3期、2012年3月。
124. 清水安三著、清水畏三編、李恩民·張利利·邢麗荃譯《朝陽門外的清水安三：一個基督徒教育家在中日兩國的傳奇經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4月。
125. 祝力新「《滿洲評論》及其時代」、東北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2年5月。
126. 崔慧姝「梁漱溟鄉村建設運動及其爭議研究」、南開大學博士論文、2012年5月。
127. 濱田直也「孫文與賀川豐彥—以1920年在上海的會談為中心」、《近代史學刊》第9輯、2012年5月。
128. 李春林「關於“肉薄”“竹內魯迅”的札記」、《文化學刊》2012年第5期、2012年9月。
129. 羅文香「“竹內魯迅”的新畫卷—靳叢林先生《竹內好的魯迅研究》讀後」、《外國問題研究》2012年第4期、2012年12月。
130. 韓星「辜鴻銘中國文化重建的思想理路」、《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103年第1期、2013年1月。
131. 王娟·董海巍「東本愿寺與北京覺生女子中學校」、Proceedings of 201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mics and Social Science (ICESS 2013) Volume 14、2013年1月。
132. 楊庚新「紀念一代宗師梁樹年先生」、《東方收藏》2013年第3期、2013年3月。
133. 任春艷「魯迅與美術」、安徽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4月。
134. 王垠丹「抗戰時期“新民會”管控下的北平音樂生活研究」、中央音樂學院碩士論文、2013年4月。
135. 林敏潔「冰心任教日本事跡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4期、2013年4月。
136. 薩蘇「馮玉祥 手拿饅頭的“拿破崙」」、《環球人物》2013年第10期、2013年4月。
137. 楊姿「基督宗教界的魯迅印象與魯迅資源利用」、《魯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3期、2013年4月。
138. 朱文通「李大釗與近代中國社團」、河北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3年4月。
139. 靳明全「竹內好與藤井省三的魯迅論」、《華文文學評論》2013年號、2013年4月。
140. 王淼「華北淪陷區基督教會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3年5月。
141. 何明星「《中國哲學史略》的世界之旅」、《中國圖書評論》2013年第6期、2013年6月。
142. 錢昕怡「“國亡生活在”——長谷川如是閑的中國游記及其中國觀」、《日本問題研究》2013年第2期、2013年6月。
143. 吳光輝「竹內好筆下的魯迅形象—以《藤野先生》的譯文為媒介」、《學術月刊》2013年第7期、2013年7月。
144. 張明杰「今關天彭與魯迅關係考略」、《魯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8期、2013年9月。
145. 趙京華「魯迅與日本的中國研究—以橘樸為中心」、《新文學史料》2013年第4期、2013年11月。

146. 朱文通「李大釗與基督教文化」、《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2014年1月。
147. 王雨海「別樣的魯迅——日本人心目中的魯迅印象」、《信陽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2014年1月。
148. 於曉丹「辜鴻銘的翻譯觀：英譯儒經中的會通思想」、《長春師範學院學報》2014年第1期、2014年1月。
149. 劉偉「中國現代文學對日本的影響問題研究」、《山東社會科學》2014年第3期、2014年3月。
150. 楊慧「魯迅白俄敘事考論」、《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2014年3月。
151. 彭定安「魯迅的經典意義與當代價值」、《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2014年3月。
152. 李伊雯「關於魯迅在日本接受情況的考察研究」、電子科技大學碩士論文、2014年4月。
153. 王升遠「“文明”的恥部——侵華時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天橋體驗」、《外國文學評論》2014年第2期、2014年5月。
154. 樂融「清水安三為何推崇魯迅」、《上海魯迅研究》2014年第1期、2014年5月。
155. 王柯「中國民族主義的形成與近代中日關係」、《文化縱橫》2014年第3期、2014年6月。
156. 李濤「民國時期國立大學招生研究」、西南大學博士論文、2014年10月。
157. 于寧「1937年通州事件研究」、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4年10月。
158. 朱成甲「李大釗研究：異域嚶鳴傳友聲——讀後藤延子《李大釗·留日學生群體與日本社會思潮》書稿」、《北京黨史》2014年第6期、2014年11月。
159. 李文卿「魯迅之後：“戰爭期”（1937-1945）的滿系文壇與文藝」、《南方文壇》2014年第6期、2014年11月。
160. 黃艷芬「朱湘與魯迅」、《新文學史料》2014年第4期、2014年11月。
161. 林衛國「梁延武：中日文化交流的架橋人」、《文史月刊》2015年第1期、2015年1月。
162. 王建明「抗戰爆發前留日學人對日傳播中國文化的特點」、《東北亞學刊》2015年第2期、2015年3月。
163. 朴新春（PARK.SAE-BOM）「對韓國三一運動與中國五四運動中婦女參與的比較研究」、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4月。
164. 王升遠「大正時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體驗及其政治、文化心態」、《社會科學研究》2015年第3期、2015年5月。
165. 王建濤「華世奎與近代京津地區的文化教育事業」、《藝術品》2015年第5期、2015年5月。
166. 秦悅「李大釗如何做人與讀書？」、《協商論壇》2015年第6期、2015年6月。
167. 黃喬生「《八道灣十一號》寫作札記」、《魯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8期、2015年8月。
168. 陶方宣·桂嚴《魯迅的朋友圈》香港中和出版、2015年8月。
169. 劉穎「“二戰”前日本對中共研究的特點」、《理論月刊》2015年第9期、2015年9月。
170. 黃艷飛「李大釗和士大夫精神」、《鄭州師範教育》2015年第5期、2015年9月。
171. 李斌瑛「辜鴻銘與日本武士道——錯寄東瀛的文化理想」、《日本問題研究》2015年第5期、2015年10月。
172. 歐陽哲生「新文化的異域回響 胡適及其著作在日本」、《中國文化》2015年第2期、2015年10月。

月。

173. 徐志民「日本侵華殖民教育之決策—基于戰時日本檔案的分析」、《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0期、2015年10月。
174. 陳子善「魯迅書贈清水安三字幅考略」、《當代文壇》2016年第1期、2015年12月。
175. 無記名「北京匡時 斬獲10億」、《中國拍賣》2016年第1期、2016年1月。
176. 無記名「魯迅16字偈語點亮匡時」、《收藏》2016年第3期、2016年2月。
177. 王升遠「昭和初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體驗及其政治、文化心態」、《山東社會科學》2016年第2期、2016年2月。
178. 李騰「北京匡時二〇一五年秋拍綜覽」、《榮寶齋》2016年第2期、2016年2月。
179. 汪洋「全球化語境下對魯迅的跨文化研究—以日本為例」、《采寫編》2016年第1期、2016年2月。
180. 陳隆「審視2015年秋拍」、《文物天地》2016年第3期、2016年3月。
181. 黃喬生「朝花夕拾又思君—清水安三藏魯迅手書佛偈」、《海內與海外》2016年第3期、2016年3月。
182. 樂融「魯迅在日本的接受和傳播—從兩個日本人說起」、《上海魯迅研究》2015年冬、2016年3月。
183. 尚人「梁漱溟倫理思想研究」、哈爾濱工程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4月。
184. 梁毅「魯迅、金字招牌及其他」、《魯迅研究月刊》2016年第4期、2016年4月。
185. 張娛驍「抗戰時期華北淪陷區的基督教教育」、山東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5月。
186. 楊淼「戰時下岸田國士的中國體驗」、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5月。
187. 段園「中日戰爭期間尾崎士郎的中國體驗」、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5月。
188. 許丹青「岩波茂雄與中國—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個側面」、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5月。
189. 姬學友「魯迅域外傳播研究的一個范式—以《魯迅域外百年傳播史（1909—2008）》為例」、《安陽工學院學報》2016年第3期、2016年5月。
190. 張劍「政治的文學 佐藤春夫對魯迅的推介」、《求索》2016年第5期、2016年5月。
191. 黃喬生「“兩個巨石重鎮”與八道灣十一號」、《博覽群書》2016年第6期、2016年6月。
192. 王天嬌「梁漱溟人生哲學研究」、河南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6月。
193. 黃艷燕「莫言文學作品在日本的譯介與接受」、南京工業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6月。
194. 李妮文「周作人附逆期間的生存與思想研究」、東華理工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6月。
195. 王觀泉「新發現魯迅四言詩偈：我的考證」、《上海魯迅研究》2016年春、2016年6月。
196. 張凌子「A Study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 Literary Translation」、西安外國語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6月。
197. 朱文通「李大釗與近代中國人民對社會主義道路的自主選擇」、《領導之友》2016年第13期、2016年7月。
198. 王小惠「“微觀史學”與“復調”敘事—讀黃喬生著《八道灣十一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年第7期、2016年7月。
199. 松枝茂夫「周作人先生紀事」、《現代中文學刊》2016年第4期、2016年8月。
200. 徐炳三「盧溝橋事變前日本基督教界的反戰言行及其本質」、《民國檔案》2016年第3期、

- 2016年 8 月。
201. 劉迎「北京での坪田譲治 戦時下における日本児童文学の一側面」、『日本學研究』第26期、2016年10月。
202. 武繼平「“魔都”上海的日文雜誌《自然》考察—兼考魯迅與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的關係」、『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 6 期、2016年12月。
203. 牟成梅「讓學生享受貼近生活和個性的教育——“人生遠足”綜合實踐課程紀實」、『基礎教育參考』2017年第 2 期、2017年 1 月。
204. 鄒心平「論辜鴻銘的“罵”及其後果之異」、『莆田學院學報』2017年第 1 期、2017年 2 月。
205. 熊愛文「汪榮寶與近代中日交流（1901-1931）」、湖北大學碩士論文、2017年 4 月。
206. 曹珊「東亞學者論“日本魯迅研究”」、『長江文藝評論』2017年第 2 期、2017年 4 月。
207. 何敏燕「中日比較視野中的魯迅“棄醫從文”研究」、武漢大學碩士論文、2017年 5 月。
208. 萬珺「林芙美子的作品在中國的接受」、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7年 5 月。
209. 曹珊「魯迅在日本的“文學旅行”與本土化」、武漢大學碩士論文、2017年 5 月。
210. 馬麗芳「從中江藤樹的“孝”思想中看其教育思想」、湖南大學碩士論文、2017年 5 月。
211. 周渝陽「大正時期的綜合雜誌對五四運動的認識」、武漢大學碩士論文、2017年 6 月。
212. 謝群「關於近代在華日本顧問的研究—甲午戰爭後～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東北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7年 9 月。
213. 邱海燕「人生遠足 學而事人」、『中學地理教學參考』2017年第20期、2017年10月。
214. 盧軍「從薛綏之致呂元明書信管窺其魯迅史料編寫工作」、『魯迅研究月刊』2017年第10期、2017年10月。
215. 陳言「在思想連鎖中發現“北京”」、『讀書』2017年第12期、2017年12月。
216. 李少涌「中日文化差異下翻譯的動態對等」、北京外國語大學碩士論文、2018年 4 月。
217. 張娟「魯迅題《法儀兄弟八十人等造像》拓片考」、『文物天地』2018年第 8 期、2018年 8 月。
218. 董卉川「魯迅與新文化的歷史回顧與深刻反思——“魯迅與新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魯迅研究月刊』2018年第10期、2018年11月。
219. 鄧黎「李大釗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研究」、東北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8年11月。
220. 周吉宜「關於周作人研究史料—周作人後人保存的部分」、『現代中文學刊』2018年第 6 期、2018年12月。
221. 王貴祿「從犀利到平和：魯迅的雜文創作與書法藝術修養」、『天水師範學院學報』2018年第 6 期、2018年12月。
222. 張建軍「尋路鄉土：梁漱溟、晏陽初鄉村建設理論與實踐比較研究」、浙江大學博士論文、2019年 1 月。
223. 劉芳「二戰前後日本記者眼中的“中國民眾形像”」、『大連大學學報』2019年第 1 期、2019年 2 月。
224. 陳言「留學場域內的感情與邏輯—以近代日本學問留學生為例」、『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 4 期、2019年 4 月。
225. 鐘兆云「辜鴻銘的人生多面體」、『同舟共進』2019年第 7 期、2019年 7 月。

（了）